

# 百年風騷，誰主浮沉？

## ——二十世紀台灣兩大傳統詩社：櫟社、瀛社 之對照觀察\*

廖振富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 摘要

日治時期台灣詩社林立，是台灣文學史上的特殊現象，其中以台北瀛社、台中櫟社、台南南社最具代表性，被合稱為「台灣三大詩社」，其領導者分別是台灣各地的社會菁英與仕紳，不論在傳播媒體或文化界，他們往往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其中瀛社、櫟社的活動都延續到戰後，瀛社迄今仍持續運作，而櫟社則大約在1960年代逐漸式微，兩社之發展及興衰，與台灣近百年來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變遷因素息息相關。

由於台灣文學研究日受重視，瀛社與櫟社近年分別由國家文化單位主辦「紀念成立百年學術研討會」，筆者有感於此，乃以「百年風騷，誰主浮沉？——20世紀台灣兩大傳統詩社：瀛社與櫟社之對照觀察」為題，就這兩大詩社的創社背景、組織特質、往來互動、活動樣貌、發展歷程、盛衰因素等，進行多重角度的對照觀察，以進一步理解日治到戰後台灣傳統詩社的特質，及其與20世紀台灣社會、文化環境的關係。

關鍵字：傳統詩社、櫟社、瀛社、台灣文學、古典詩

---

\* 本文為中興大學文學院96學年度「燎原專案」研究成果，初稿發表於「瀛社成立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2008年11月1-2日，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承辦。本文定稿曾參考周益忠、吳福助教授及匿名審查人的諸多寶貴意見，進行大幅度的修改，謹致謝忱。

# Two Traditional Poetic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in Twentieth Century:

## Th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tween “Li” and “Ying”

Liao, Chen-Fu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Abstract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re was a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poetic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which marked an extraordinary phenomenon in Taiwan's literary arena. Among these poetic organizations, there were three remarkable ones established in the northern, middle and southern Taiwan, the names of which were “Ying”, “Li” and “Nan” respectively. Owing to their high reputation, they were referred to as “Three Main Poetic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whose leaders and members were usually known as elites and the gentry. Among fields of media, culture and politics, these people basically had their fame and influence. Literary activities of “Ying” and “Li” were still held frequently even after WWII. “Ying” still operates till now, but literary activities in “Li” declined gradually during the 60'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se two poetic organizations demonstrated various factors resulting in transformations of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for nearly a hundred year in Taiwan.

Due to more and more emphasis laid on the study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had held symposiums about “The Memorial Conference on the One Hundred Year Anniversary of “Li” poetic organization” and “The Memorial Conference on the One Hundred Year Anniversary of “Ying” poetic organization” respectively in recent years, discussing

these two poetic organizations with different aspects, which affected the author to focus on the topic, “Two Traditional Poetic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in Twentieth Century: Th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tween “Li” and “Ying.” The author tried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Li” with “Ying” through their foundation backgrounds,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mutual interactions, types of literary activities, process of developments, and factors of their rise and fall. Based on these multiple analysis and observations, the author aimed to have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poetic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from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postwar year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aiwan society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traditional poetic organization, Li poetic organization, Ying poetic organization, Taiwan Literature, classical poems



# 百年風騷，誰主浮沉？

## ——二十世紀台灣兩大傳統詩社：櫟社、瀛社 之對照觀察

### 一、前言

台灣古典文學研究，在當代台灣文學研究領域中逐漸受到重視，並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若以時代斷限來看，相對於明鄭與清領時期，近年學界關於「日治時期台灣古典文學研究」的進展尤其快速，其中以現代性議題、詩社研究、女詩人研究最受矚目。<sup>1</sup>就詩社研究觀察，除了學位論文陸續出現不少地區型詩社研究，更具指標性的「日治時期台灣三大詩社：台北瀛社、台中櫟社、台南南社」也都有學位論文或研究專書產生。<sup>2</sup>這三大詩社先後創立於20世紀的最初10年，<sup>3</sup>迄今都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然而，台中櫟社與台南南社，早已消失於歷史的舞台，唯獨台北瀛社歷經百年而不衰，甚至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與年輕世代的加盟而注入全新的活力，在21世紀開啟台灣古典詩全新發展的無限可能，這是近代台灣文學社團中的異數，值得深究。<sup>4</sup>

1 關於傳統詩社的現代性議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12）。詩社研究，則可舉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6.03）為代表。女詩人研究，研究對象包括石中英、蔡旨禪、張李德和、黃金川等人，已累積多篇個論或合論之碩士論文。詳細討論，可參許俊雅，〈回顧與前瞻——近二十年來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述評〉，《漢學研究通訊》25卷4期（2006.11）。

2 關於櫟社研究之學位論文，最早是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86），屬於史學研究。10年後，廖振富完成以〈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為題的博士論文（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6），屬於文學研究。再經10年，兩本專著先後問世：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許俊雅，《黑暗中的追尋：櫟社研究》（中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06）。南社之研究，則有吳翰琪，〈南社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7）。關於瀛社研究，有張端然，〈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台北：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3 台灣三大詩社之成立年代如下：台中櫟社（1901）、台南南社（1906）、台北瀛社（1909）。

4 參考「臺灣瀛社詩學會 網路古典詩詞交流園地」，[tpps.org.tw/phpbb](http://tpps.org.tw/phpbb)。

2001年12月，以「紀念櫟社成立百年」為主軸的一系列活動，分別由國立台灣文學館與台中縣文化局支持，在櫟社活動的主要據點霧峰熱烈展開。其中包括由許雪姬、廖振富共同策劃的「櫟社文物展」、「櫟社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中臺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兩場研討會共計發表13篇櫟社研究之相關論文。<sup>5</sup>時隔7年，同樣由國立台灣文學館支持，委託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策劃的「瀛社成立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於2008年11月1-2日在台大隆重舉行，共計發表14篇瀛社研究相關論文，<sup>6</sup>而台北市文獻委員會也同時推出「瀛社百年紀念特展」。這種現象具體見證台灣文學研究，受到政府文化單位的高度重視，反映本土文化建構的基礎扎根與歷史縱深的挖掘正逐漸開展。而櫟社與瀛社紀念成立百年的學術研討會，分別都由國家文化單位支持，盛大舉辦，在日治時期全台眾多詩社中，只有這兩大詩社受到如此高度重視，其重要性與代表性不言而喻。

筆者長期致力櫟社研究，對日治時期台灣詩社相關議題保持高度興趣，有感於此，乃以「百年風騷，誰主浮沉？——20世紀台灣兩大傳統詩社：瀛社與櫟社之對照觀察」為題，首先透過史料之整理耙梳，探討兩個大詩社的成立背景、命名含意，接著以各種史料及新發現的兩社往來書信為例證，探討兩社之往來互動情形。本文第三部份則採取分期研究之對照觀察，綜合鳥瞰兩大詩社從日治到戰後的發展軌跡，從中釐析兩大詩社如何逐漸衍生不同的發展路徑，最後試圖歸納兩大詩社盛衰走向不同的原因。

長期以來，討論櫟社與瀛社，很難避免從國族認同或民族主義的視角加以比較定位，而歸結為「櫟社具有鮮明抗日屬性，瀛社較具親日色彩」的二分法，而近年學界對此種觀點，已迭有反省。本文雖試圖避免再度落入此一研究模式之窠臼，但由於研究視角偏向兩大詩社集體活動之鳥瞰觀察，實

---

5 前者包括7篇櫟社研究論文，後者也有6篇與櫟社相關，合計13篇。作者包括許雪姬、林瑞明、施懿琳、許俊雅、黃美娥、廖振富、余美玲、楊翠、吳毓琪、陳盈達等人。其中「中臺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會後由台中縣文化局出版正式論文集。

6 這14篇論文的議題包括：瀛社與其他之比較研究、瀛社個別詩人研究、瀛社活動場域研究、瀛社詩作主題研究等。發表人依序是廖振富、龔顯宗、吳毓琪、余美玲、翁聖峯、卞鳳奎、江寶釵、王幼華、游勝冠、陳盈達、黃鶴仁、孫吉志、徐慧鈺、吳彩娥。

則無法完全迴避此一議題。不過筆者仍試圖以史料為核心，如實勾勒這兩大詩社的活動面貌，以及在20世紀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多重轉折下，兩大詩社如何因應？產生何種結果？至於這兩大詩社作品的深入討論，乃至他們在台灣文學史上扮演何種角色？具備何種意義？曾產生何種影響？等更龐大的議題，或許可期待有興趣的研究者持續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就個別詩人專論而言，由於櫟社詩人的研究相對豐碩，而瀛社詩人的個論才剛起步，因此關於詩社成員之文學表現如何？成就與侷限何在？乃至兩大詩社整體文學成績之評估，目前研究條件尚未具足，本文也無法討論。另外，由於20世紀源自西方的現代文明浪潮改變人類生活樣貌，台灣也直接深受衝擊，兩個詩社對「現代性」的反應，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限於篇幅，本文對此一議題只能暫時割愛。

必須說明的是，本文討論之時間下限，大約止於1964年，主要原因是：1956年林獻堂病逝日本之後，櫟社活動極少，實質上已逐漸趨於式微；而瀛社第三任社長魏清德1964年去世，可說象徵日治時期創社元老的時代已然結束，因此本文大致以1909-1964年作為兩社對照觀察之時間基準。至於瀛社當代之活動，牽涉的是更複雜的時代與文學環境之變遷，以及傳統詩社如何現代化的議題，本文不列入討論範圍。

## 二、兩社資料對照表、成立背景及組織特質

### (一) 兩社資料對照表<sup>7</sup>

	櫟社	瀛社
成立與活動時間	成立於1901年，主要活動於日治時期，戰後逐漸衰微。	成立於1909年，日治時期活動頻繁，戰後重整，活躍迄今。

7 本表之主要參考資料，櫟社方面，包括筆者歷年相關之研究成果（1）〈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6）（2）專書《櫟社研究新論》（3）專書《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07）。至於瀛社資料，則主要參考《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龍文出版社出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所收錄之瀛社詩人之個別詩集多種，以及新出版的林正三、許惠玫編，《臺灣瀛社詩學會會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10）。

命名含意	「櫟」典故出自《莊子》，代表「棄材」、無用之木，隱喻日本領台之後傳統文人無奈自棄之遺民心境，同病相憐、相濡以沫之結社。	「瀛」取義自「瀛海」、「瀛洲」，「瀛海」隱喻詩社如大海廣納眾材，「瀛洲」原為海上仙山，又台灣古稱瀛洲，或藉此隱喻該社有代表全台之雄心。 <sup>8</sup>
組織性質	封閉式的嚴密組織，入社資格極嚴，排他性強，不輕易招收社員。	開放式的機動組織，入社資格不設限，包容性大，廣納社員，以量取勝。
集會方式	定時社員小集，或春、秋二會，或一年大會一次，長期由傅錫祺負責聯絡。中衰時期，集會次數與出席人數極少。	例會頻繁，幾乎每月均有例會，一年大會一次，以《臺灣日日新報》發佈集會訊息。參與人數從數十人到上百人為常態。
次級組織	萊園詩會（1910年代前後）、中央金曜會（1910-1917？）漢詩習作會（1940年代）	中央擊鉢吟會、食飯會、有志吟會、同意吟會、漢詩研究會（1940年代）
社員人數	社員多半維持20多人，衰微階段人數不足10人，各階段社員總數約60多人。	社員眾多，難以精確估計，通常維持有數十人或上百人，各階段社員總數可能超過500人。
活躍成員	賴紹堯、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傅錫祺、陳槐庭、林仲衡、陳瑚、陳貫、莊高、蔡惠如、連橫、葉榮鐘、莊垂勝。	顏雲年、洪以南、林湘沅、謝汝銓、魏清德、林佛國、黃植亭、尾崎古村、許梓桑、黃贊鈞、張純甫、黃純青、李建興、莊玉坡。
作品出版	日治時期先後有總集《櫟社第一集》、《櫟社第二集》出版（後者被禁，現存孤本待訪查），展現集體成果。個人詩集已出版流通者，有十餘種。	日治時期無全體社員選集出版，但曾公開徵詩，出版配合國策之詩集，個人詩集出版流通者較少。戰後為紀念成立60、70、80、90年，各有紀念詩集出版。
史料整理	相關原始文獻如日記、詩稿、文件等，近年新發現極多，並已陸續出版。	《臺灣日日新報》已有電子資料庫，2008年11月該社出版4本專書，史料整理大有進展。 <sup>9</sup>
傳播媒介	《台灣新聞》殘缺嚴重、《臺灣文藝叢誌》陸續整理中。	《臺灣日日新報》數量龐大，保存資料最為豐富。

## （二）兩社之成立背景與命名含意

櫟社之成立是由霧峰林家的林癡仙發起，1899年林癡仙結束為期四年多（1895-1899）的中國漂泊生涯，返台定居，面臨台灣滄桑巨變，其內心充

8 根據連橫《台灣通史·開闢紀》之說，台灣古稱瀛洲，「瀛社」以此為名，或許僅取義於此。但筆者推測，也可能取義自「瀛海」，隱喻詩社如大海廣納眾材。關於瀛社命名含意，感謝吳福助教授之修正意見。

9 為配合「瀛社百年紀念研討會」之隆重舉行，這4本專書都是在2008年10月交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於會中贈送給與會之學者參考，書名分別是：（1）林正三、許惠玟編，《臺灣瀛社詩學會會志》；（2）林正三、許惠玟編，《歷屆詩題便覽》；（3）林正三、洪淑珍編，《十年題襟集》；（4）林正三、翁正雄編，《瀛社風義錄》，充分展現該社整理史料之用心與壯志。

滿強烈的痛苦不安與無奈哀怨。大約在1901年左右，與賴紹堯、林幼春籌組櫟社，「櫟社」之名典出莊子，林癡仙之姪，也是櫟社最初的發起人林幼春，對該社命名由來的詮釋最為精要：

櫟社者，吾叔癡之所倡也，叔之言曰：「吾學非世用，是為棄材；心若死灰，是為朽木。今夫櫟，不材之木也，吾以為幟焉。其有樂從吾游者，志吾幟。」<sup>10</sup>

可知該社定名為「櫟」之深意，乃是隱喻其消沈自棄的遺民心境。<sup>11</sup> 櫟社成立之後，並未向日本當局報備或申請，1909年日本官員曾公開參與活動，表達希望加入為社員，目的其實是行監視之實。另一方面，更私下透過基層特務，暗中調查該社之成員背景與活動情形。<sup>12</sup> 不過，櫟社自始至終並未接納日本人為社員，該社數十年之詩會活動，日人參加者亦不多見。<sup>13</sup> 日本官方對該社活動之戒心則時時可見，舉其大端，包括1911年邀請梁啟超訪台在中之集會，日本官方曾派員監視；1943年《櫟社第二集》出版後立即被查禁等。

與此大異其趣的是1909年在台北成立的瀛社，一開始就是在日本官方支持同意的前提之下所創立，根據林佛國戰後所寫的專文〈瀛社簡史〉提及：

- 
- 10 林幼春，〈櫟社二十年問題名碑記〉，文見《櫟社第一集》書前，無頁碼，大正13年2月發行原版，臺中：博文社活版印刷部。原書為林幼春長孫林中堅先生所提供，敬致謝忱。
- 11 櫟社以「櫟」命名之深意，出自《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匠伯不顧，遂行不輟……曰：『已矣！物言之矣，散木也……是不材之木也。』」
- 12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三）》明治44年（1911）12月16日載：「特務新屈氏奉支廳長命，來查我櫟社友支廳管內幾人？林峻堂字癡仙、傅錫祺字鶴亭、林載昭字望洋、呂瑄星字蘊白、黃炎盛字旭東、我字升三。袁炳修、呂厚庵身故，社長蔡啟運亦身故，今尚未選舉何人。每一年開春會一次，恒在台中瑞軒，會費大約三元，詢罷回去。」（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0.11），頁147。
- 13 1909年4月3日櫟社在台中集會，傅錫祺《鶴亭詩集》有〈櫟社雅集〉七絕四首記其事，其中第四首之後自註：「廳內之山田孝使、及鷹取田亦願日盟為社友。」但顯然未被該社接受。至於日人出席櫟社活動，除1909年4月3日之集會有台中廳長與部屬參加之外，1910年4月23日詩會，有安江五溪。1912年6月15日舉行十週年大會，有柳田陵村。1914年4月27日，曾舉辦日本漢詩人初山衣洲來台之歡迎會。其後幾乎都找不到日人出席該社活動的蹤影，甚至1922年擴大舉行20週年大會亦然。另，根據1911年11月16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在臺中的日本人組成「清流吟社」，成員有安江五溪、柳田陵村、田口香石等人，該年11月12日舉行一週年大會，櫟社的林癡仙、連橫曾出席。近年台大圖書館特藏室所收藏1910-1913年間的櫟社詩稿，也有上述三位日人的作品，詳見廖振富，〈台大圖書館藏櫟社詩稿的主題內涵探析〉，《櫟社研究新論》，頁142-144。

日據時代，《臺灣日日新報》社漢文部同人，為謀保存國粹，並發揚光大，遂有籌設瀛社之議。經該報守屋善兵衛社長同意，正式聲請，囑該部尾崎秀真先生接洽，立得兒玉總督面允，<sup>14</sup>乃於民國前三年己酉花朝，集北臺詩人百五十餘人，開創立大會。<sup>15</sup>

可見瀛社之成立，是由《臺灣日日新報》社日籍社長向在總督府聲請，經總督同意始正式成立。該社取名由來，並無明確之史料記載，1956年2月《台北文物》刊出「詩社特輯」，其中由「文山遺胤」所寫的〈臺北詩社之概觀〉一文認為瀛社是由趙一山所命名，並推測因台灣古稱「瀛洲」，因取以為名者。<sup>16</sup>筆者則另從字義判斷，「瀛」本意即大海，該社之命名可能取自「瀛海」，「瀛海」為大海之意，隱喻該社如大海廣納眾材，也可能另有「登瀛」之暗喻。<sup>17</sup>

兩相對照，櫟社成員抱持遺民心境，乃是面對台灣割讓之後時代變局的挫敗者，相濡以沫的社團。成員之思想意識，與日本治台當局或多或少採取較為疏離的位置，乃至柔性的抵抗姿態。而瀛社則是在日本官方鼓勵協助之下，由任職官方報社的北部文人所籌組，成員顯然較能順應新的時代環境，適時調整心態，思想意識顯得意興風發，進而與當局採取親善友好之互動關係，實屬必然之舉。這種作為與心態，曾任第二任社長的謝雪漁曾有清楚的自述：

余年十二，始學作八比及試帖。年十五，從蔡玉屏夫子學，初學作律

14 黃美娥考證，瀛社成立當時總督應為佐久間左馬太，並非兒玉源太郎，林佛國此說有誤。參見黃美娥〈北臺第一大詩社——日治時代的瀛社及其活動〉，《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07），頁229-273。

15 本文收錄於《瀛社創立六十週年紀念集》（台北：瀛社編譯委員會，1969）。

16 文山遺胤，〈臺北詩社之概觀〉，《台北文物》4卷4期（1956.02），頁3。作者「文山遺胤」有可能是林佛國的筆名，林佛國是景美人，屬於文山地區，他在日治時期擔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是瀛社活躍成員之一。

17 「瀛洲」原為海上仙山，唐太宗曾設「文學館」選聘賢才，有房玄齡等18學士入選，被稱為「登瀛洲」，省稱「登瀛」，所謂「瀛洲十八學士」指文學家之備受重視榮寵有如置身仙境，也可能藉此暗示該社之聲勢浩大，地位崇隆，受到當局之高度重視。南投草屯有創立於清朝道光年間之「登瀛書院」，日治時期宜蘭有「登瀛詩社」，「登瀛」之寓意與此相關。

絕……甲午歲，版圖易色，為應時急策，力習帝國語言文字……國覺在學中，閱臺日報章，讀藤園督憲及棲霞藩憲，<sup>18</sup>與內臺官紳，賡唱迭和佳什，見獵心喜，時一為之。國覺畢業，官署濫竽，雖技癢有作，然隨得隨棄。比入臺日報漢文部執筆，廣與社會接洽，頻與同事唱籌，後倡設瀛社，洪逸雅君為社長，余為之副，或出課題，或開例會，花晨月夕，吟朋燕集，興高采烈。洪君沒，余繼任，前後約三十年間，所詠之數不少。<sup>19</sup>

文中謝雪漁提及年少時曾學八股文與律詩、絕句，日本領台之後他體會局勢不同，迅速改弦易轍，勤學日文，不過在國語學校就讀期間，因看到《臺灣日日新報》時常刊載總督兒玉源太郎（別稱藤園將軍）、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與台日官紳的唱和詩作，於是見獵心喜，常跟隨寫詩唱和，日後進入《臺灣日日新報》社任職，乃進而與同事籌組瀛社，長達二十多年，由此段自述可知：瀛社之成立，與日本官方助長漢詩寫作風氣有顯著之關連。

瀛社與日本官方及《臺灣日日新報》社互動極為密切，日人參加其活動是常態，甚至也有日籍社員。如1909創立之年的第三期例會，便是由《臺灣日日新報》社之村田副社長、伊藤編輯長擔任值東，並預擬課題為〈恭讀戊申詔敕〉，而其後之數十年發展，與日人始終保持緊密關係，所作各種課題詩擊鉢吟詩，更密切配合官方政策。

不過以上所述只是大致之分野，吾人必須考慮文學與政治之間的複雜糾葛，往往牽涉多重或隱或顯的內外因素，而人類內在心靈的幽微難測，與實際外在應世的艱難，更增加問題的複雜性。若更細緻考察則可發現，標

18 「藤園督憲」指當時總督兒玉源太郎（別稱藤園將軍），「棲霞藩憲」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自號棲霞山人）。

19 謝雪漁，〈自敘〉，《奎府樓詩草》，頁3。該文寫於昭和辛未（1931）。現收入「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二輯第15種，《雪漁詩集》、《晴園詩草》合刊本（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6）。

榜「遺民詩社」的櫟社，其實也常見與日本官方酬唱的诗文作品，<sup>20</sup> 甚至不同階段也都曾出現配合日本官方國策的作品。<sup>21</sup> 而相反的，由於瀛社詩人甚多，個人政治認同取向可能也會有所差異，而以其社史延續之久，不論是集體或個別創作，累積的數量極為龐大，必然也蘊藏豐富多元的內涵值得深入研究，<sup>22</sup> 若以政治取向為探討分析的單一視角，必然有所侷限。

### （三）兩社組織特質之差異

前文曾列表對照兩大詩社的組織特質，櫟社為「封閉式的嚴密組織，入社資格極嚴，排他性強，不輕易招收社員。」瀛社則是「開放式的機動組織，入社資格不設限，包容性大，廣納社員，以量取勝。」試進一步說明如下。

就具體史料來看，櫟社一成立便訂有社規，「櫟社規則」所顯示的嚴謹性與理想性，尤其是對品德、文學素質之堅持，在當時詩社組織中顯得相當特殊。就組織之嚴謹性而言，不只入社資格有清楚規範，並規定社員需繳交社費，該社即以此為活動之基金（該社決議書稱為「櫟社基本財產」），存於銀行以孳生利息，甚至曾動用這筆基金投資買彩票（彩券），可見該社一開始便設定社團長期運作所需的經濟條件。<sup>23</sup> 另外櫟社社員名單、居住地、年齡，以及入社、退社或死亡時間，都有清楚記載，這與瀛社組織鬆散、規

20 如由初山衣洲（1855-1919）所編，明治33年（1900）出版的《南菜園唱和集》，以及由館森鴻、尾崎秀真編，明治37年（1904）出版的《烏松閣唱和集》兩本台灣詩人與日本官方集體唱和的詩集，除了瀛社詩人作品，也都收錄不少櫟社詩人作品。

21 黃美娥，〈帝國魅影——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343-380。

22 王幼華〈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構接——以瀛社為例〉（《台灣學研究》7期，2009.06）認為：瀛社在1937年殖民政府取消漢文欄之前，大部分課題以純粹的詩作為主，政治性的題目較少。而廈門大學朱雙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漢詩社詩作的主题分析〉（「台灣古典詩與東亞各國的交錯」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2008.11.29-30），則針對《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所刊出的詩社作品（以瀛社為主），分別從「現代（殖民）」、「鄉土」、「傳統」三大主題，進行詩作文本分析。

23 張麗俊保存一份1910年4月26日所訂的「櫟社決議書」，該決議書開宗名義就提到：「夫詩社之設，乃詩界之團體，風雅之機關也。欲團體之鞏固，機關之敏活，使其維持於久遠者，其策伊何？則惟有立基本財產為最善之策也。吾人結社之初心，既云欲扶輪風雅，切磋商道義矣，果爾則凡有裨益於我社之舉，當無不勇為，今對此立基本財產之倡議，敢有異言乎！」這種看法可說同時考量理想與實際，極為高明的見地。至於以櫟社基金買彩票，則見於基金保管人傅錫祺日記之記載。

模龐大，究竟擁有多少社員無從確知之情形，差異頗大。

就理想性而言，櫟社創社之初即言：「主旨在以風雅道義相切磋，兼以實用有益之學相勉勵，且期交換智識，親密交情。」櫟社規則第14條，原本甚至考慮成立「櫟社公所」收藏書報雜誌，以供閱覽。此種構想頗類似1920年代台灣文化協會在各地所推動的「讀報社」，推廣知識交流之動機相當清楚，相當具有前瞻性。<sup>24</sup> 櫟社規則第15條則是：「本社可依其時宜發刊詩文雜誌以作本社機關。」據此可知：該社於1919年創辦《台灣文藝叢誌》，其構想也早在創社初期即已萌芽。以上均可看出該社創立之理想性，並不單純以吟詩唱和、社友聯誼為目的。

該社對文學品質之堅持，如清水人鄭邦吉曾表示希望加入櫟社，林幼春、林獻堂都認為其文學成就不夠突出，並未答應。<sup>25</sup> 當然，若依實際社員之成就考察，社員中未必人人皆有傑出之詩才，可能也有出於社交考量或人際因素而入社者（如林耀亭、吳上花），但整體而言，櫟社由於入社資格限制極嚴，確實較容易維持品質的一貫性。

對品德的堅持，將連雅堂、林子瑾開除是最著名的例子。筆者已有專文詳論，於此不贅。<sup>26</sup> 有時甚至是基本理念或主張的不同，而未必是道德問題，也有可能導致內部之矛盾而遭受核心成員之排擠，如清水人王學潛，可能因曾與林幼春就「孝道」問題發生論辯，而在社內討論中有幹部提議：是否可請他主動退社，理由是「意氣不合」，當然社中也有反對意見。後來因王學潛去世，風波自然化解，<sup>27</sup> 但由此例可見該社具有強烈的排他性。

對照之下，瀛社組織特質與櫟社的差異相當明顯。該社一開始便是設定以廣納北部各詩社為目的的鬆散組織，後來一再擴充規模，社員人數不斷

24 根據櫟社規則第14條：「本社可依其時宜擴張規模，設置櫟社公所，購藏內外書籍或新聞於其中，聽社員隨時閱覽。」

25 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櫟社成立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國家台灣文學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主辦，2001.12.09），頁16-17。

26 廖振富，〈論連橫與櫟社之互動與決裂——兼論櫟社「抗日屬性」之再評估〉，《櫟社研究新論》，頁344-355。

27 此事詳見《傅錫祺日記》1927年之記載，日記正由筆者整理中，尚未出版。

增加。平時活動是採取機動性的任務編組方式。直到1918年才正式選出社長、幹事、評議員，1922年才訂定會則，逐步組織化。由於該社包容性大，入社資格並無嚴格限制，先後入社人數太多，甚至有海外加盟者，以致想全面掌握社員資料，加以明確記載，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至於該社之基本屬性，一開始便具有明顯的社交聯誼性質，積極開闢人際圈是加入者的共同目的，常見為社員擔任各種官職（如顏雲年1921年擔任總督府評議會員，1923年謝雪漁、林佛國新任州協議員）等舉辦祝賀會，甚至在相關報導中特別提及：「此番本島人被命為評議員者九人，其中五名，為詩社關係人，詩人時大有榮」，<sup>28</sup> 這與櫟社成立初期抱持「遺民」心境的消極性格迥然有別。論道德理想性，似乎也不宜以過度的高標準加以要求。以下一事可為例證，1910年社員羅秀惠、周笏臣共同因私人道德瑕疵被瀛社除籍，<sup>29</sup> 但後來羅秀惠又曾以來賓身份參加瀛社活動，甚至發表祝詞演說，<sup>30</sup> 可見瀛社包容性極大，對道德理想性的堅持，也抱持較為寬鬆的尺度。反觀連橫在1930年被櫟社除籍之後，櫟社成員幾乎與他斷絕往來，讓他大感難堪，兩相對照，差異不小。

### 三、兩社之往來互動

1909年3月7日瀛社創立於台北，出席者50多人，<sup>31</sup> 一創立發起人洪以南便自詡與台中櫟社、台南南社成「鼎足」之勢。<sup>32</sup> 將近一個月後，4月3

28 《臺灣日日新報》7551號，大正10年（1921）6月12日；8449號，大正12年（1923）11月27日。引文見7551號。

29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742號，明治43年（1910）10月14日，第3版。據該報報導：羅秀惠因貪圖寡婦蔡氏碧吟家資，謀贅其家，故與前妻王氏罔市（王香禪）離婚，又其實為周笏臣所策動聯絡。故瀛社同人以此二人有玷衣冠，且違犯該社章程，將其逐出，以昭公論。

30 《臺灣日日新報》9858號，「瀛社例會兼有關係評議會員祝宴」，昭和2年（1927）10月6日。

31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251號：「淡江人士。及寄寓諸公。為提振風騷。倡開吟會，已登前報。其社名之曰瀛，確定此星期（即本月七日）在平樂遊雅集。並折柬邀請內地僑寓諸吟客，以增該社光。」明治42年（1909）3月5日，第5版。

32 洪以南，〈瀛社雅集 得庚字〉：「滿天星辰伴長庚。桃李芳菲會北城。結得騷壇成鼎足（我臺南有南社，中有櫟社，故及）。春風舊雨一詩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260號，明治42年（1909）3月16日，第4版。

日櫟社在台中舉行該社創設後的首次對外公開詩會，出席社員16人，另有台南詩友謝石秋等3人，以及台中廳佐藤廳長，及其下屬日人兩人，台籍通譯一人與會。據《櫟社沿革志略》形容：「是為本社成立以來未曾有之盛會。」但若論出席人數，其實遠比瀛社之例行集會少。單從規模及參與人數來看，瀛社創立雖晚於櫟社多年，論聲勢則明顯比櫟社浩大。廖振富的博士論文〈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曾根據林癡仙日記的記載，看出兩大詩社之間隱然有互爭龍頭的心結，<sup>33</sup>不過包括南社在內的台灣三大詩社，也在此時展開積極的往來互動。

以瀛社與櫟社之互動為例，兩社之正式往來，始於1909年7月底至8月初櫟社詩人北遊之行，接受瀛社的招待。根據新發現的《傅錫祺日記》相關記載推測，瀛社與櫟社最初互動的居間聯繫人物可能是洪以南與連橫。<sup>34</sup>1909年在台中加入櫟社的連橫，與瀛社領導人洪以南結識較早。而陳槐庭1909年5月16寫給傅錫祺的明信片，則提及瀛社洪以南早已熱切邀櫟社詩人北遊，櫟社應該踐約，相關內容如下（原信第五行起）：<sup>35</sup>

北遊之約，暫緩無妨，癡仙有晤，再與訂約，或函答之。近日以南疊來催促行期，謂瀛社諸友望吾輩如望雲霓，亦甚雅意，此約不可不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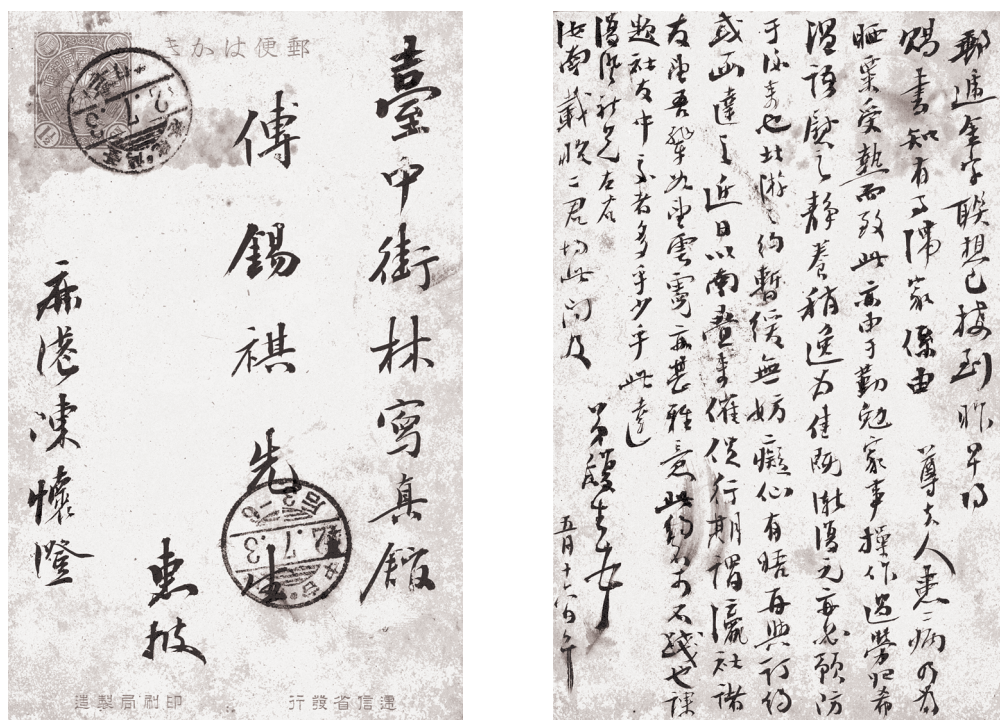
1909年6月7日，傅錫祺初識洪氏於台中瑞軒，一見如故。<sup>36</sup>筆者推測：當時櫟社重要成員林癡仙等人也在場，可能這次會晤時洪以南再度當

33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6），頁45。

34 連雅堂，〈瑞軒詩話（十）〉（刊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1911）2月17日）記載：「臺北洪逸雅先生。書畫雙絕。而詩亦出入唐宋諸家。余遊北時。逸雅以畫蘭帖囑題。攜歸瑞軒。已西春季櫟社大會之夜。余出以示同人。且為逸雅徵詩。一時酒酣耳熱。以次傳寫。得詩十數首。」可見連橫與洪以南之結識在先。又，《傅錫祺日記》1909年4月16日：「接槐庭信，促題洪以南（台北人）畫蘭詩。」

35 此明信片由傅錫祺家屬保管，並提供給筆者參考。內容註明的寫信日期是5月16日，但根據正面郵戳，發信時間是7月3日。以下本文所引述之書信原件，皆是由傅錫祺家屬所提供。

36 《傅錫祺日記》1909年6月7日：「夜晤台北洪以南氏於瑞軒，蓋初會也，其人頗爽快，一見如舊相識。」



陳槐庭致傅錫祺明信片封面與內容，明治42年（1909）7月3日發信。

面熱情邀請，因而促成7月櫟社詩人的台北之行。1909年7月下旬，櫟社社員傅錫祺、林癡仙、陳槐庭，及林獻堂（時尚未入社），謝頌臣（丘逢甲表兄，未加入櫟社）聯袂北遊。8月3日，瀛社社員26人在平樂遊旗亭，舉辦櫟社詩人歡迎會。<sup>37</sup>這是兩社成立後首度舉辦的公開聯誼活動，從此建立兩社之間的聯繫網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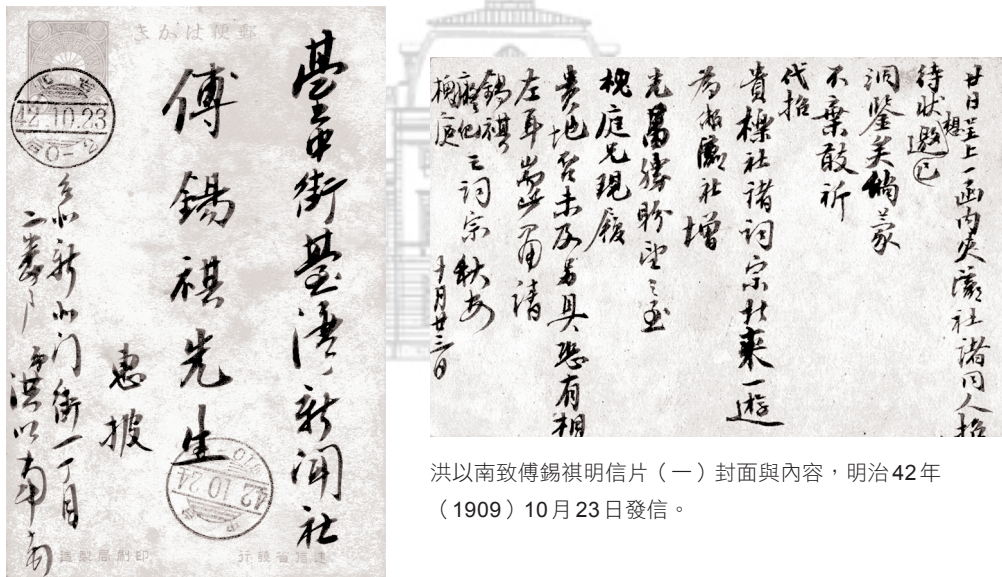
同年10月28日瀛社召開秋季總會，洪以南曾致函櫟社邀請參加，不過根據現有資料推測，櫟社社員這次並未北上出席瀛社這次邀約，傅錫祺收藏洪以南之邀請明信片如下：

37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378號，明治42年（1909）8月3日，第7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384號，明治42年（1909）8月10日，第7版。根據傅錫祺日記1909年8月3日記載，可知瀛社以洪以南為首，出席者有26人。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傅錫祺《鶴亭詩集》，1909年都有不少這次北遊與瀛社互動的相關詩作，林癡仙有〈洪以南詞兄招飲逸園〉、〈瀛社大會席上〉、〈次家湘沉兄原韻〉；傅錫祺有〈洪茂才以南招宴逸園〉、〈瀛社諸子招宴於平樂遊即席賦呈〉、〈次韻和瀛社諸君子四章〉等。

廿日呈上一函，內夾瀛社諸同仁招待狀，想已邀洞鑒矣。倘蒙不棄，敢祈代招貴櫟社諸詞宗北來一遊，為敝瀛社增光，曷勝盼望之至。槐庭兄現履貴地否？未及另具，恐有相左耳。崑此。函請  
錫祺、癡仙、槐庭三詞宗秋安

十月廿三日

基於彼此禮尚往來，1910年3月27日，瀛社春季大會在艋舺龍山寺舉行，林幼春代表櫟社出席。<sup>38</sup>而瀛社之回訪櫟社，則是大約一個月後，瀛社主力洪以南、謝汝銓、王毓卿、林湘沅、李漢如等人，一起參加1910年4月23日櫟社在台中舉行「庚戌春會」。其他來賓，包括新竹、台中、葫蘆墩（豐原）、霧峰、彰化、鹿港、嘉義、台南等各地詩人。這次櫟社詩會規模之大遠勝去年，更值得一提的是，參與者除了東部之外，涵蓋台灣南北各地，就性質而論，此會實為日治時期全島詩人大型詩會之濫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在詩會前後，有多篇關於此會之報導與作品密集刊出，林湘沅還



洪以南致傅錫祺明信片（一）封面與內容，明治42年（1909）10月23日發信。

38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573號，明治43年（1910）3月29日，第5版。

特別將此會經過寫成專文〈赴櫟社大會日記〉，分兩天刊登。<sup>39</sup>文中提及連橫曾在會中演說，兼提議「各吟社合併，每年輸出課題，來賓及社員皆大贊成，擬後日各社皆出意見書，折衷一是」，<sup>40</sup>隨後全體出席者51人合影留念。該文記其盛況：「不減蘭亭盛會。人數且過之。洵臺灣開關三百年來所未見也」。<sup>41</sup>

另外，連橫在1910年12月至1911年3月陸續發表的〈瑞軒詩話〉中，也曾有多篇紀錄這次活動的經過與作品，其中第11則特別介紹瀛社社員謝雪漁、林湘沅參加這次詩會的詩作，內容如下：<sup>42</sup>

鄉友謝雪漁林湘沅二君。均為北報記者。庚戌春季來臨櫟社大會。主於瑞軒。各有即事之詩。雪漁云。著鞭悔讓祖生先，落後居然馬不前。一片溫情春浩蕩。十分吟興月嬋娟。漫將學派分唐宋。拼把新詞譜管弦。旗鼓中堅抗南北。聚奎星海象垂天。湘沅云。霓裳同日詠群仙。珠玉隨風落九天。到眼燈光千點麗。<sup>43</sup>當頭月色十分圓。清才濟濟來南北。綺語紛紛雜管絃。三百年來無此月。風流照耀大墩巔。<sup>44</sup>

謝雪漁詩作的後半首說：「漫將學派分唐宋，拼把新詞譜管弦。旗鼓中堅抗南北，聚奎星海象垂天」，強調北中南詩社不應分派別，而應同心協力，印證三大詩社確實有「既競爭又結盟」的微妙關係。至於林湘沅詩作的後半首：「清才濟濟來南北。綺語紛紛雜管絃。三百年來無此月。風流照耀大墩

39 分別刊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1910）4月30日，第5版、5月1日，第7版。根據該文，林湘沅4月23日從台北坐火車南下台中，集會是從4月23日晚上，持續到25日深夜。而他本人與南社的陳瘦雲、連應榴等人更在26日下午接受林獻堂招待，到霧峰林家菜園參觀，曾作詩七絕四首記之，當天晚上接受獻堂晚宴招待，一直到27日上午回台中之後，又被櫟社社友挽留，舉行擊鉢吟詩會，以「瑞軒觀芍藥」為題，會後才辭別北歸。

40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1910）4月30日，第5版，原文誤為「並」。

41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1910）4月30日，第5版。

42 連雅堂，〈瑞軒詩話（十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873號，明治44年（1911）3月5日。

43 原刊本作「麗」，根據林湘沅，〈赴櫟社大會日記〉所附本詩，可知「麗」為「麗」之誤。詳見下註。

44 林湘沅，〈赴櫟社大會日記〉，刊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1910）4月30日，第5版、5月1日，第7版。附有此詩，文字小異：「霓裳同日詠群仙。珠玉隨風落九天。到眼燈光千點麗。當頭月色十分圓。清才濟濟傾南北。綺語紛紛雜管絃。三百年來無此樂。文星輝聚大墩巔。」

巔。」則可看出詩會充滿娛樂效果，熱鬧繽紛的盛況。

綜合以上資料，這次詩會對日後台灣詩社活動的蓬勃發展，顯然具有關鍵性的推動作用，而櫟社與瀛社也在這次活動之後互動更加頻繁。傅錫祺家屬所保存之洪以南會後致櫟社之答謝函可為證，原件內容如下：

拜啟

貴社大會，叨陪末坐，曷勝榮幸！又蒙深厚愛顧，更沒齒所不能忘也。所恨者歸時為俗事所窘，連日繁忙，不暇奉候。固先知會湘沅諸人，聯名肅函道謝。失禮伏乞 原宥。貴社宿題，頃已偷閒免就，何敢言詩，聊以塞責耳。別紙錄呈，未妥之處，乞郢正為感。此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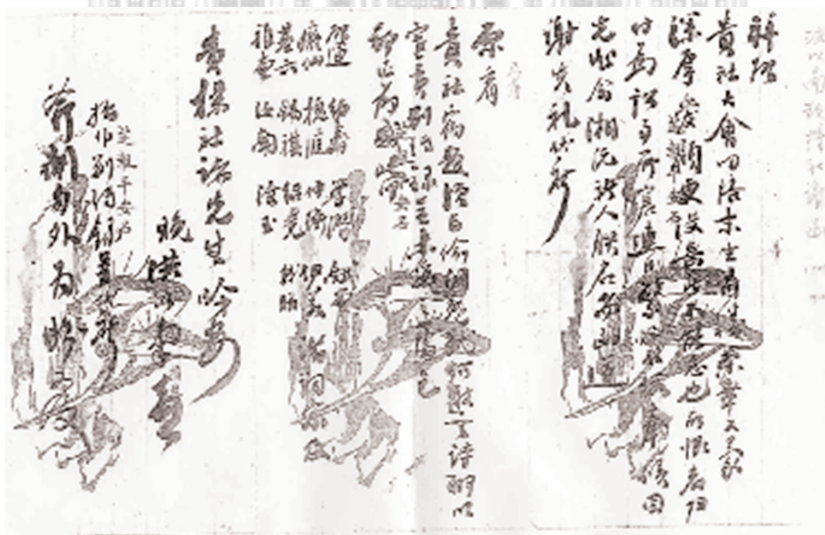
啟運	幼春	學潛	獻堂	
癡仙	槐庭	仲衡	伊若	
基六	錫祺	紹堯	載昭	諸詞宗及
雅堂	汝南	滄玉		

貴櫟社諸先生吟安

晚洪以南頓

拙作別紙錄呈，伏祈

斧削勿外為盼。 又及。



洪以南參加「櫟社庚戌春會」後致櫟社之答謝函，1910年。

明治43年（1910）5月，櫟社為已故社員呂敦禮編妥《厚庵遺草》一書，傅錫祺曾代表櫟社郵寄30冊委託洪以南轉贈北台詩人，洪以南於6月11日函覆傅錫祺，表示已將櫟社所贈之《厚庵遺草》30冊轉贈各界，信中除清楚交代贈書名單之外，並邀櫟社來台北大稻埕一遊。內容如下：

前日寄《厚庵遺草》參拾冊拜領，即代轉送諸人列後。

伊藤壺溪、日下蓬蓮、尾崎白水、安江五溪、林湘沅

謝雪漁、魏潤庵、李逸濤、楊仲佐、黃纘鈞

陳永錫、林佛國、黃菊如、王毓卿、林子楨

王自新、倪炳煌、李漢如、莊鶴如、潘濟堂

陳篤竹、神戶 陳曉凡、神戶 許雷地、莊玉波、葉鍊金

王少濤、莊玉卿、許梓桑、顏雲年、洪以南

舊五月十三日大稻埕會頗形熱鬧，乞台駕邀同 諸先生光臨一觀為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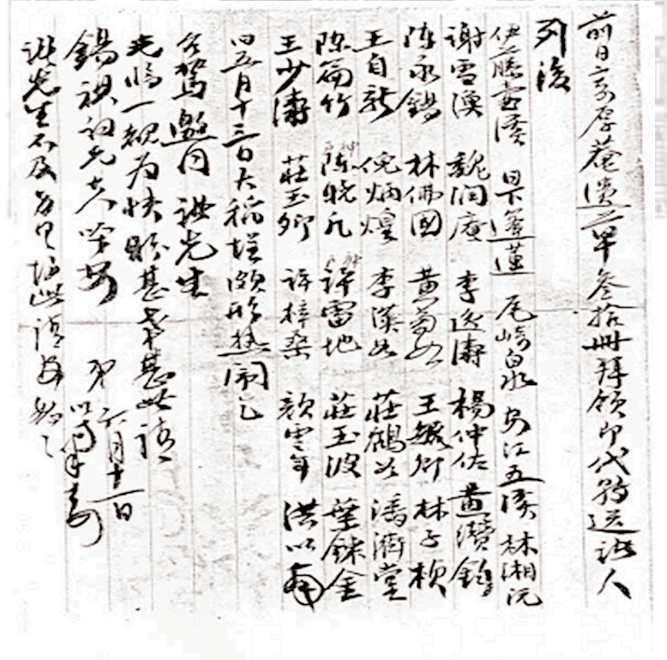
盼甚！幸甚！此請

錫祺詞兄大人吟安

弟 以南頓

六月十一日

諸先生不及另具函。此請恕之。



這封信所記錄之贈書名單30人，包括在台日本人、瀛社成員，及旅居日本神戶之台灣人，可據以考察當時台灣詩壇生態，乃至台日之間的漢文交流與跨國移動情形。可以想見這些人應該是當時瀛社的活動主力，或者是洪以南往來較頻繁的人脈。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也在明治43年（1910）6月9日的「編輯日錄」（5版）中，特別記載6月8日洪以南帶了10多本櫟社所贈《厚庵遺草》轉贈報社同仁一事。<sup>45</sup>

經過1909、1910年兩次集體互訪之後，瀛社與櫟社各自確認在北部與中部詩壇的領導地位。1911年1月30日瀛社舉行詩會，曾將擊鉢吟詩稿郵寄櫟社林癡仙評選。<sup>46</sup>3月22日，櫟社林仲衡曾擔任瀛社詩會的詞宗。<sup>47</sup>這是兩社之間的零星互動。1911年3月底，林獻堂邀請梁啟超訪台，則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化界的一大盛事，也是兩社密切互動的另一事例：林獻堂事先曾寫信給瀛社的洪以南、李漢如，請求「藉重其周旋」。<sup>48</sup>3月28日，梁氏一行人坐船抵達基隆。4月1日，以瀛社成員為主的台灣北部仕紳曾舉行歡迎會，<sup>49</sup>《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曾有數篇短文報導梁氏訪台。<sup>50</sup>時隔多年，謝雪漁在昭和6年（1931）出版的《奎府樓詩草》，有詩〈太史梁啟超先生〉仍念念不忘當時台北瀛社歡迎梁啟超的宴會：「吟樽瀛社會名流，款洽同登

45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編輯日錄」欄，明治43年（1910）6月9日。

46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842號，明治44年（1911）2月1日，第3版。

47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891號，明治44年（1911）3月24日，第3版。

48 林獻堂致函洪以南、李漢如，請求「藉重其周旋」，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895號，明治44年（1911）3月28日，第3版「編輯日錄」。

49 關於梁啟超訪台經過與影響，早期研究可參見黃得時，〈梁任公遊臺考〉，《臺灣文獻》16卷3期（1965.09）。近期研究，參見廖振富，〈台大圖書館藏櫟社詩稿的外緣問題考察〉，頁107-112、〈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中的劉銘傳——以櫟社徵詩（1912）作品為主的討論〉，頁178-182，《櫟社研究新論》；許俊雅，〈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09）。

50 《臺灣日日新報》關於梁氏訪台之訊息，如以下數則，其一是前述林獻堂致函洪以南、李漢如，請求「藉重其周旋」（洪以南、林湘沅與櫟社在1910年有密切的互動，故出面協助）。其二是林湘沅曾發表〈車中口占贈梁任公先生〉，（《臺灣日日新報》3896號，明治44年（1911）3月29日，第1版）。其三是4月12日「編輯日錄」，提及梁氏於4月11日離台的訊息，瀛社成員魏清德、洪以南，及邀訪梁氏來台的林獻堂、新竹詩人鄭鵬雲，曾共同到基隆送行。另外，黃得時〈梁任公遊臺考〉認為：林湘沅曾〈車中口占贈梁任公先生〉，是陪同梁啟超到台中的車上所寫，但本詩發表時間是3月29日，梁氏南下台中是4月2日，因此寫作時間應該是3月28日，林湘沅等人到基隆迎接梁啟超，一起坐車到台北所寫。更何況文獻顯示，4月2日梁氏南下台中是由林獻堂陪同，林湘沅並未隨行。

古酒樓。故署荒涼虛使節，管絃凝碧動深愁。」<sup>51</sup>

1912年6月15-18日，櫟社舉行成立十週年大會，瀛社出席者僅有魏清德一人，<sup>52</sup>但從在霧峰林家舊宅發現的《櫟社十週年大會詩稿》中，包括〈追懷劉壯肅〉、〈笨港進香詞〉兩個詩題，則抄錄有瀛社詩人魏清德、林湘沅、林石崖（佛國）等人作品多首。<sup>53</sup>魏清德曾在1912年6月12日致櫟社函，答覆將參加櫟社十週年大會，內容如下：

辱承招赴貴社大會，擬追陪司抄錄之職，祈 諸先生教之。〈懷劉壯肅詩〉萬望斧正，「笨港進香」目未嘗 其事，恐有靴襪之感，謹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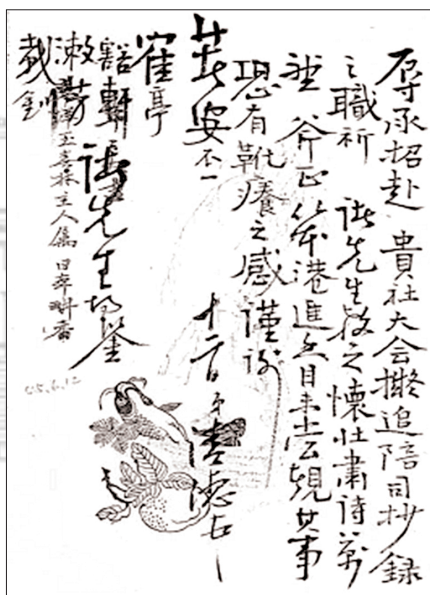
著安 不一

鶴亭

豁軒 諸先生鈞鑒 十二日 弟 清德 頓

漱芳

載釗



51 謝雪漁，《奎府樓詩草·感舊篇》，《雪漁詩集》、《晴園詩草》合刊本，頁45，原書於昭和6年（1931）出版。

52 根據《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6月12日、16日「編輯日錄」資料，瀛社倪炳煌、黃贊鈞，原本有意出席，後因故未赴會。

53 廖振富，〈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中的劉銘傳——以櫟社徵詩（1912）作品為主的討論〉，《櫟社研究新論》，頁182。其中〈追懷劉壯肅〉一題，其實就是沿用1911年梁啟超受櫟社邀訪，在台中的歡迎宴會席上所擬的詩題。

信函內容簡短，但書法字體相當俊秀，具有鮮明特色。信中提及的〈懷劉壯肅詩〉、〈笨港進香〉是櫟社舉辦十週年大會，預先擬題邀請來賓撰寫之課題詩。魏清德〈懷劉壯肅詩〉詩作已收入《櫟社十週年大會詩稿》，原件目前收藏於台大總圖書館五樓特藏室。而關於這次詩會活動之經過，以及〈追懷劉壯肅詩〉相關作品90首之討論，筆者曾有兩篇論文詳論之，文中曾針對魏清德作品有所分析，分析其作品之書寫立場屬於「認同日本統治，讚美劉銘傳，進而稱許日本治台成就」，而相對於瀛社，櫟社詩人作品則多數偏向漢族認同，充滿時代滄桑的感慨。<sup>54</sup>

1918年10月櫟社出面籌組「台灣文社」，1919年1月正式發行《臺灣文藝叢誌》，籌備期間為了擴大聲勢，1918年10月櫟社社長傅錫祺曾致函台灣各地傳統文人，徵求加盟，其中包括瀛社成員包括洪以南、謝雪漁、魏清德三人。後來他們都被網羅為「台灣文社」第二年理事。而在《臺灣文藝叢誌》第一期所列的評議員名單45人中，瀛社成員則涵蓋：洪以南、黃贊鈞、林湘沅、林佛國、李逸濤、魏潤菴（清德）、謝雪漁等要角。這是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漢學界首度的大規模結盟，意義非凡，不過實際推動「台灣文社」之運作、負責《臺灣文藝叢誌》之編輯發行工作的，還是以台中櫟社成員為主力，瀛社成員與其他各地文人之加盟，除了偶或應邀擔任文宗、詞宗之外，象徵意義似乎大於實質作用。

1921年10月23日瀛社曾舉辦全台詩社擊鉢聯吟大會，值得注意的是以氣節著稱櫟社詩人林幼春曾出席擔任詞宗，並受邀擬題，而他當時已經列名「台灣文化協會」的評議員。翌日，總督田健治郎於東門官邸招待全部詩人，由文書課鷹取岳陽籌畫，總督府各局長為陪賓。<sup>55</sup> 事後，承辦人鷹取岳陽將相關作品編成《大雅唱和集》一冊，作品以田健治郎作品為首：

54 廖振富，〈台大圖書館藏櫟社詩稿的外緣問題考察〉，頁112-119、〈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中的劉銘傳——以櫟社徵詩（1912）作品為主的討論〉，頁175-240，《櫟社研究新論》。關於魏清德作品〈追懷劉壯肅詩〉之分析，見該書頁208-209。

55 《臺灣日日新報》7687號，大正10年（1921）10月26日，第5版。

我愛南瀛景物妍，竹風蘭雨入詩篇。堪欣座上皆君子，大雅之音更蔚然。

接著是台灣詩人依韻唱和之作，排列在最前面的是瀛社核心領導幹部作品，依序為林熊徵、顏雲年、洪以南、謝雪漁、魏清德、林佛國。至於櫟社成員出席者有：林幼春、連雅堂、鄭汝南（玉田）、林子瑾、施家本。這種場合所寫，幾乎所有作品都難以避免歌功頌德一番，最值得注意的是林幼春的作品：

江山詩筆兩清妍，萬紙傳鈔憂玉篇。鳴鳳自關新氣運，寒鴉羣噪總徒然。

後兩句頗有微言大義，比喻總督田健治郎之作有如「鳴鳳」，台籍詩人唱和則是「寒鴉羣噪」，看似將作者涵蓋在內的自謙之詞，「總徒然」三個字背後其實隱藏著深刻的無奈與嘲諷，意味台灣詩人被動員來接受總督的召見、安撫，再怎樣歌頌甚至暗藏不滿，無非就像烏鴉發出嘎嘎難以入耳的噪音而已，有什麼用呢？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謝雪漁詩集《奎府樓吟草》有一首〈林幼春吟友〉曾特別道及此事：

深愧田橫島士無，不終咕嗶作迂儒。詩題也自藏深意，教詠群鴉噪鳳圖。<sup>56</sup>

前兩句用「田橫」的典故，暗示林幼春強烈的漢族意識，不認同日本統治，並有實際獻身政治改革之志，不願以「迂儒」自我定位。後兩句指出林幼春這首詩的隱藏深意，確實與眾不同。以謝雪漁明顯的親日立場，能看出林幼春的抱負與思想特徵，並且以「同情的理解」的語氣如實道出，甚至有贊佩之意，似乎隱約透露他內心對族群認同的矛盾與衝突。不過更值得關注的是，此一事例提醒我們：若因當時文人不同的政治取向，而輕易將他們簡化成「親日」與「抗日」兩大陣營，或誤以為他們必然有激烈對立而互不往

56 謝雪漁，《奎府樓吟草》，《雪漁詩集》、《晴園詩草》合刊本，頁74。

來，如此之視角將有所蒙蔽，無法洞悉隱藏其中的錯綜複雜關係。不論是就詩社整體傾向或詩人的個別表現觀察，瀛社與櫟社成員的政治認同取向，不宜簡化看待，當作如是觀。<sup>57</sup>

1920年代是台灣民族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少數較具有新思想的傳統文人與新世代知識青年結盟，以行動與組織積極領導文化啟蒙運動，而這批傳統文人最具指標性的代表者，就是林獻堂、林幼春、蔡惠如三人，他們既是櫟社社員，也是台灣民族運動的活躍領導者。蔡惠如常往來於日本與中國，對櫟社活動介入不多，至於林獻堂、林幼春的政治立場，則與櫟社多數成員的保守傾向仍有所差異。因此討論櫟社屬性，應考量諸多因素，不宜將上述三人的政治參與視為櫟社的集體表現，而若過度強調瀛社與櫟社的「政治屬性」有重大分野，難免犯了以偏蓋全之病。<sup>58</sup>

1922年10月櫟社舉行20週年紀念會，可視為該社活動的顛峰時期，瀛社出席者有魏清德、張純甫、顏雲年、林述三等人。會中顏雲年曾代表來賓發表祝辭演說，瀛社魏清德、南社趙雲石等人則應邀擔任詞宗。此會之後，櫟社之林獻堂、林幼春投入不少心力於政治運動，1923年12月「治警事件」發生。1925年判刑確定，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林獻堂赴美旅遊，林幼春多蟄居家中養病。由於櫟社活動的主要支持者，除了林獻堂、林幼春之外，幾乎全賴社長傅錫祺之居間聯繫，但傅錫祺之財力與號召力均有其侷限，使得櫟社活動在1927年之後逐漸沈寂，一直到1931年才藉由舉辦30週年大會試圖重振聲勢。這次詩會的來賓，包括北中南各地詩友26人，<sup>59</sup>但瀛社並無社員代表出席。筆者查閱相關史料發現：從1922年以後，再也找不到瀛社與櫟社兩社集體往來的記載。

57 林幼春在1939年10月去世後，謝雪漁曾有弔詩〈輓林幼春吟朋〉：「豔說詩文一代豪，中臺卅載振風騷。先知後覺天民任，鑄史鎔經聖學高。噪鳳群鴉曾婉刺，驚蛇打草不辭勞。老成凋謝今將盡，熱淚難禁為一滔。」（《風月報》98期，「詩壇」欄，昭和14年（1939）11月21日。）除了肯定其文學成就，更強調其從事政治與文化啟蒙運動之貢獻。

58 廖振富，〈論連橫與櫟社之互動與決裂——兼論櫟社「抗日」屬性的再評估〉，《櫟社研究新論》。

59 傅錫祺，《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之「增補櫟社沿革志略」，頁1。

綜合觀察 1909-1945 的三十多年間，瀛社與櫟社往來最密切的年份，僅僅集中在 1909-1912 的最初四年。除了 1910、1912、1922 年數次大型活動及少數個別互動之外，瀛社與櫟社以整體詩社為名義的互動往來並不頻繁。不過這兩大詩社，確實在全台眾多詩社中各居於領導地位，引領風潮，動見觀瞻，則是無庸置疑的。

#### 四、兩社發展歷程之對照觀察

以下為方便對照觀察櫟社與瀛社之發展歷程，筆者擬大致依年代先後區分成五個階段加以分析（請參見下表）。1912 年以前已於上文述及，不另說明。至於以 1964 年為時間下限，理由已見前述。筆者先製成簡表以方便掌握，再詳細解說。至於劃分不同階段的依據，將於下文中說明。

階段區分	櫟社	瀛社
1912-1918	轉型期： 「遺民詩社」時代的結束與首度轉型，醞釀全台傳統文人串連的集體力量。	壯大期： 規模持續擴大，衍生次級組織，論聲勢與參與人數，均穩居全台詩社之冠。
1919-1926	鼎盛期： 櫟社主力成員或創辦《臺灣文藝叢誌》，少數投入「台灣文化協會」政治運動的黃金時期。	鼎盛期： 瀛社主辦兩次全島詩人大會，接受前後兩任總督召見，與日本當局互動密切。
1927-1933	組織鬆動期： 文協分裂，林獻堂、林幼春逐漸淡出政治活動，吳子瑜主掌本期櫟社重大活動，主導權鬆動轉移，造成活動性質轉變。	穩定發展期： 1927 洪以南去世，謝雪漁接任社長。常借例會兼為社員擔任總督府評議員、翻譯官、或接受敘勳、褒章等榮銜舉行祝賀會。
1934-1940	活動中衰期： 櫟社活動漸稀，林獻堂長時間滯留日本，櫟社第一代社員凋零殆盡，面臨傳承危機。	穩定發展期： 1936 年瀛社有志者另組「瀛社有志吟會」。莊玉坡、鄭金柱分別舉行數次配合國策之徵詩活動。
1941-1945.8.15	復興傳承期： 林獻堂與社長傅錫祺緊密合作，帶領第二代社員重整旗鼓，在艱困時局中致力延續漢文命脈。	戰爭宣傳期： 密切配合戰爭時期日本當局之國策，動員詩社力量，致力所謂「吟詩報國」之方針。例會詩題有「祝志願兵制度施行」、「祝新嘉坡陷落」、「海軍志願」等
1945.8.16-1964	戰後式微期： 戰後短暫力圖重整，邀集新社員加盟，但因經歷二二八事件之時代創傷，櫟社逐漸衰微而淡出歷史舞台。	戰後重整期： 經歷時代轉折而短暫停頓，隨即結合大陸來台人士與黨政資源，恢復組織活動，迅速重新崛起。

### （一）櫟社轉型期，瀛社壯大期：1912-1918

1912年6月，櫟社創社十週年大會，廣邀全台詩社成員參加。1912年10月，顏雲年新居「環鏡樓」落成，舉辦瀛社大會。1918年7月，瀛社正式選任洪以南與謝雪漁為社長、副社長。1918年10月，櫟社決定創立台灣文社，並展開全島漢文界之大串連。綜合觀察上述，此一階段對兩社而言，都處於初期蓬勃發展的狀態，以下試詳述之。

1912年櫟社舉行十週年大會，1913年有兩次集會，相關詩稿多冊都完整留存至今。<sup>60</sup> 1914年林癡仙投入社會運動，但隨即於1915年去世，1917年賴紹堯也接著去世。這兩位櫟社創始人的去世，代表著櫟社原本偏向「遺民詩社」屬性的時代正式結束，而同時也正醞釀櫟社第一度轉型的開始。1918年9月20日，櫟社與鰲西吟社在清水蔡惠如宅「伯仲樓」召開兩社聯合會，約有三十餘人參加，席上蔡惠如「深慨漢文將絕於本島，倡議設法維持」，於是櫟社在本年10月起緊鑼密鼓展開「台灣文社」的籌畫，廣邀全台傳統漢文界共襄盛舉，並獲得熱烈的迴響。台灣文社隨即在1919年1月正式發行《臺灣文藝叢誌》，櫟社從此將關懷焦點擴大到全島漢文界的大串連，一方面積極引進、傳播西方的新知識，一方面致力整理、保存台灣的漢文傳統。

至於瀛社此一階段之重大活動，包括（1）1912年11月26-27日，顏雲年新居「環鏡樓」落成，舉辦瀛社大會，主賓共五十餘人參加，得詩三百餘首，日後結集為《環鏡樓唱和集》。（2）1915年6月19日，瀛社與桃園吟社舉行聯合大會。除淡社、南社、竹社均派員觀禮外，手島檢察官長、隈本學務部長、內田民政長官、加福廳長、田中主事等諸多總督府高級官員亦蒞場觀禮。<sup>61</sup>（3）1918年7月13日，瀛桃竹聯合擊鉢吟會，會中顏雲年倡議選舉社長、副社長、幹事、評議員等。後由顏雲年推舉洪以南為社長，謝汝

60 廖振富，〈台大圖書館藏櫟社詩稿的外緣問題考察〉、〈傳統與現代的辯證——台大圖書館藏櫟社詩稿的主題內涵探析〉，《櫟社研究新論》。

61 《臺灣日日新報》5388號，大正4年（1915）6月21日，第4版。

銓為副社長，魏清德、劉篁村為幹事，顏雲年、林問漁、許迺蘭、林湘沅、李逸濤、林石崕、黃贊均、陳其春、倪炳煌、李碩卿為評議員。此外，出席者公推顏雲年為三社聯合會長、簡朗山為三社幹事。<sup>62</sup>

歸納瀛社本階段之發展，其一是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瀛社的組織化。從原本即涵蓋的台北、基隆兩地，擴充到將桃園、新竹兩地詩社納入。而顏雲年在這個階段擔任三社聯合會長，實質扮演北台灣詩社「總舵主」的角色。其二，日本官員的參與，說明瀛社向來著力於與政府當局關係的經營，是該社創社以來不曾改變的方針之一。

## （二）兩社鼎盛期：1919-1926

1919年1月，台灣文社正式發刊《臺灣文藝叢誌》，其實際編輯群以櫟社12名成員為核心，但台灣文社社員參與者遍及全台，據發起人之一的林子瑾說不滿一年，入社人數至少有五百人。該雜誌後來先後改名為《臺灣文藝旬報》、《臺灣文藝月刊》，<sup>63</sup>前後發行六年。<sup>64</sup>該刊主要內容有兩大類，第一類是傳統漢文學的保存與發揚，諸如定期舉辦徵詩、徵文活動，整理、刊登臺灣重要詩文集，第二類是引進西方日本的現代知識，涵蓋文學、歷史、地理、科學、體育、藝術等不同範疇，幾乎無所不包。

1921年10月，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成立，林獻堂被推選為總理。1924年7月，林獻堂、林幼春、蔡惠如等人為了與辜顯榮等人的「有力者大會」對抗，發起「無力者大會」聲勢浩大。1925年2月20日，「治警事件」判刑

62 《臺灣日日新報》6488號，大正7年（1918）7月15日，第4版。

63 台灣學界關於「台灣文社」之研究，單篇論文有施懿琳，〈台灣文社初探——以1919-1923的《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柯喬文，〈日治前期漢文傳媒與現代性研究——臺灣文社與《臺灣文藝叢誌》〉、薛建蓉，〈現代性的變奏：《臺灣文藝叢誌》一個文化剖面重構〉等。至於首部以《臺灣文藝叢誌》為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則是吳宗曄的，〈《臺灣文藝叢誌》（1919-1924）傳統與現代的過渡〉（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06）。

64 過去學界一般認為《臺灣文藝叢誌》發行7年，而經過吳宗曄長期努力，蒐集所得的最後一個年度是1924年11月15日發行的第6年第10號。雖然這一期並未刊登即將停刊的消息，但吳宗曄推論可能就是最末一期。此一推論，筆者根據《傅錫祺日記》1924年12月23日的以下記載「寓書蔡子昭君，問《文藝月刊》已擬由來年休刊，何不預告社員？」判斷，應該是正確的。

確定，7位被判刑者陸續入獄，5月10日同時出獄（包括櫟社社員林幼春、蔡惠如），櫟社曾為兩人舉行出獄慰安會。因此，本階段可視為櫟社集體致力保存漢文化，並推動新文化，以及部分領導成員積極參與政治運動的黃金時期。

就瀛社而言，與此恰成相反的走向，本階段仍相當符合創社之初之宗旨，以大型集會結合北部之政商名流為主軸，尤其與台灣總督府之建立緊密互動，是最明顯特徵。1919年5月15日，瀛桃竹三社聯合春季吟會，會中推舉大稻埕區長林薇閣（熊徵）為名譽社長。<sup>65</sup> 1925年3月8日，瀛社17週年紀念會，兼顏國年歐洲漫遊送別會，日人來賓有尾崎、小松二人。<sup>66</sup> 8月9日，瀛社五旬以上之老者另組「婆娑會」，目的是「以便談敘，藉遣老懷」。<sup>67</sup> 11月8日，瀛社中央擊鉢吟會在東蒼芳旗亭開例會，兼為顏國年新自歐美歸台開洗塵會。<sup>68</sup> 上述活動都具有明顯與仕紳名流交誼的目的性，譬如林熊徵是板橋林家代表人物之一，終生未聞有詩文創作（與顏雲年能詩不同），卻被聘為「瀛桃竹三社聯合社」名譽社長。而50歲以上社員另組「婆娑會」，也凸顯其年長一輩藉詩社聯誼的目的。又如，顏雲年於1923年去世之後，其弟國年接收其兄長期在瀛社經營的人脈資源，持續舉辦詩會，以1924年4月13日舉行的「陋園擊鉢吟會」為例，出席者多達一百一十餘人，「出席者皆送呈車票，賞品多貴重者，又有種種餘興」。<sup>69</sup> 參加人數極多，應該與此一優渥誘因有明顯關聯。

本階段兩次全島詩人大會，都由瀛社居間策劃聯繫。1921年10月23日（恰好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兩天之後），瀛社主辦全台詩社擊鉢聯吟大會，全台詩人80餘名參加，並接受總督田健治郎的召見，唱和吟詩編輯成

65 《臺灣日日新報》6794號，大正8年（1919）5月17日，第6版。

66 《臺灣日日新報》8918號，大正14年（1925）3月10日，第4版。

67 《臺灣日日新報》9072號，大正14年（1925）8月11日，第4版。

68 《臺灣日日新報》9163號，大正14年（1925）11月10日，第4版。

69 《臺灣日日新報》8585號，大正13年（1924）4月11日，第6版「陋園擊鉢續紀」；《臺灣日日新報》8589號，大正13年（1924）4月13日，第6版「陋園擊鉢吟會盛況」。

冊，前文已述及。

1924年4月25日，瀛社再度主辦台灣全島聯合吟會，與會之台籍詩人計168名（人數是前次的兩倍），日籍來賓則有相賀、尾崎兩局長、赤石何陋庵、井村大吉、小松、鷹取岳陽、山口東軒、尾崎古村、豬口鳳菴、長沼梅仙、澤谷星橋、松井梅軒、柳田陵村、茅原華山等人。<sup>70</sup>次日，總督內田嘉吉於東門官邸招待台灣全島聯合吟會與會詩人。<sup>71</sup>

正因為這次瀛社主辦台灣全島聯合吟會參加如數眾多，接受總督府籠絡的傾向太過明顯，加上各地詩社不斷擴張，參與者眾多，以聯誼交際應酬為目的，這種趨勢長期累積造成負面形象，導致從事政治、文化運動啟蒙的新世代知識份子強烈不滿。1925年初，張我軍在《臺灣民報》連續發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穢中的破舊殿堂〉、〈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sup>72</sup>加以猛烈攻擊，引發新舊文學論戰。其中〈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提及舊詩人舉辦擊鉢吟會的目的是：

也有想得賞品的，也有想顯其技巧的，也有想學做詩（技巧的詩）的，也有想得賞品兼顯揚技巧的，也有想結識勢力家的，也有想得賞品兼顯揚技巧的，也有想得賞品兼顯揚技巧兼結識勢力家的。<sup>73</sup>

其批評雖不無以偏概全之憾，但就上述大型擊鉢吟會之實際運作情形觀察，也確實能道出實情，切中其弊端，並非無的放矢。

反觀1924一整年，櫟社的林幼春、蔡惠如等人正處於「治警事件」的官司纏訟期間，櫟社對所謂「全島詩人大會」已不感興趣。1924年7月台灣文化協會以林獻堂、林幼春為首，發起「無力者大會」對抗辜顯榮發起

70 《臺灣日日新報》8601號，大正13年（1924）4月27日，第6版。

71 《臺灣日日新報》8602號，大正13年（1924）4月28日，第6版。

72 其中〈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穢中的破舊殿堂〉寫於1924.12.05，發表於《臺灣民報》3卷1號（1925.01.01）；〈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寫於1924.12.24，發表於《臺灣民報》3卷1號（1925.01.01）。

73 《臺灣民報》3卷1號（1925.01.01）。

的「有力者大會」。該年12月6日，櫟社於林獻堂宅舉行的秋會中以「演說」為擊鉢吟詩題，連一向抱持明哲保身態度、不介入政治活動的社長傅錫祺，都留下本題作品三首，見證社會脈動，表達對文協活動間接聲援的立場。<sup>74</sup> 1925年2-3月間，林幼春、蔡惠如因治警事件入獄服刑，在入獄前後兩人創作甚多相關詩詞，多半刊登於《臺灣民報》，對激勵民心有明顯宣傳效果，引起極為廣大的回響。<sup>75</sup> 而櫟社社員也有不少與林幼春、蔡惠如唱和或安慰之作。<sup>76</sup>

### （三）櫟社鬆動與中衰期，瀛社穩定發展期：1927-1940

由於發展狀況不同，櫟社可再細分為兩階段，其一是1927-1933年的「鬆動期」，其二是1934-1940年的「中衰期」。至於瀛社大抵皆能在穩定狀態下持續發展，故不再細分，本文稱為「穩定發展期」。

筆者將1927-1933此一階段，稱為櫟社「組織鬆動期」，原因是由於外在環境的轉變，櫟社本階段的活動呈現高度的人為主導因素，而林獻堂本人的行蹤，更直接影響櫟社活動的頻繁與否。1927年5月林獻堂赴歐美旅遊，1928年5月結束環球之旅，但在日本滯留至11月始返回台灣，11月18日，櫟社在台中林耀亭宅辦洗塵會。林獻堂於席上感嘆英國對文學家重視，並呼籲社員應從速完成林癡仙詩集之編輯出版，後來櫟社緊鑼密鼓進行林癡仙詩作之整理出版，一直到1933年才正式發行，這也是筆者將1933年訂為鬆動期下限的原因。

1927-1928年櫟社主幹林獻堂因遊歐美、林幼春多病，皆連續兩次未出席例會。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在記錄1928年1月的集會之後便特別寫

74 廖振富，〈傅錫祺《鶴亭詩集》所反映的人生抉擇〉，《櫟社研究新論》，頁496。

75 廖振富，〈反抗詩學：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頁93-160。

76 廖振富，〈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從晚清到二二八——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許薰文，〈日治時期櫟社文人四家詞作析論——林癡仙、陳貫、陳槐庭、蔡惠如〉（台灣師範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9.01），頁122-124、頁155-157。

到：「熱心之南強（林幼春）因多病，灌園（林獻堂）因遊歐美，故兩回相繼缺席，令人有頗覺寂寞之感。」本期吳子瑜常定期主辦櫟社集會，並另以「東山詩會」之名固定舉辦「踏青會」（古曆三月三日）、「啖荔會」、「登高會」（古重陽節），廣邀中部各詩社及外地詩友參加，似乎有取代霧峰林家，成為櫟社新領導核心之勢。也間接導致櫟社活動性質的趨於娛樂取向，並擴大與其他詩社之聯誼。

林幼春與林獻堂對此種發展態勢並非無所感，1931年櫟社成立30週年，為此特別鑄造三個銅鐘作為紀念，4月26日特別在吳子瑜的「東山別墅」舉行「初撞式」，儀式相當隆重。11月22日，櫟社紀念30週年大會正式在霧峰林家大花廳舉行，參加者社員16人，來賓26人。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記錄一段林幼春和他本人在會中的談話，格外值得深思：

幼春演說擊鉢吟非詩，用之以學詩之工具；詩要真，非出自衷心之言亦非詩，擊鉢吟多非出自衷心之言，吾人當再求上進云云。余述閉會（辭），謂櫟社三十週年紀念大會不敢過於擴大，因現在之時勢所不許，又霧峰場所狹隘，故僅招待三十餘人；次言詩人之交，無利害之關係，因淡而能久；末言以文學共勉勵後進。<sup>77</sup>

從這段兩人談話的記載，可看出林幼春對古典詩社以擊鉢吟為主要活動形式，招致新文學陣營之攻擊之流弊，有痛切的反省，並呼籲作詩要出自本心真情。而林獻堂在暗示政治情勢趨於險峻的同時，更進而強調：詩人交往，應保持無利害關係的純粹性，才能持久。林幼春與林獻堂兩人的說法，共同見證新舊文學論戰之後，櫟社希望能以身作則改革古典詩社的急切心情。可惜這次大會之後，時局日漸惡化，連帶影響詩社活動的正常推展。林獻堂乃在1933年11月的集會中提議：「每年多集會幾回，藉溫交誼」，但後來情勢演變，造成事與願違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

至於筆者稱1934-1940年為櫟社的「中衰期」，主因是每次詩會的出席

77 許雪姬編纂，《灌園先生日記（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12），頁365。

人數明顯減少，其中1938年甚至全年無集會。而這幾年間社員陸續去世，包括：1935年有陳基六，1936年有林耀亭、陳貫、蔡子昭；1938年有莊嵩，1939年有張玉書、林幼春，1940年有林仲衡、陳槐庭，總數多達9人，加上臥病在床者，老成凋謝，後繼無人，是林獻堂、傅錫祺共同的憂心。

至於瀛社，從1927-1940年間，大致呈現穩定發展的態勢。其中較為明顯的階段差異，大概是1937年以後《臺灣日日新報》取消漢文版，瀛社從此失去長達將近30年（1909-1937）的發表園地，不過《風月報》、《詩報》適時填補這個空缺。而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瀛社對國策的反應配合似乎更為積極，直到1940年代才進入另一個階段。以下試分述之。

1927年洪以南去世，謝雪漁接任社長。1932年3月20日，瀛社主辦全島聯吟大會在大龍峒孔廟舉行，出席者多達280人，謝雪漁、黃純青分別主持演說。<sup>78</sup> 1933年7月15日，旅居神戶社員莊玉坡，以「黃種同胞急起團結實行共存共榮論」為題，進行全島徵文。<sup>79</sup> 1934年7月15日，旅居神戶社員莊玉坡，以「悼東鄉平八郎元帥薨去」為題，發起全島徵詩，並委由社長謝雪漁及吳蔭培擔任詞宗。<sup>80</sup> 1936年9月17日，鷺洲吟社兼瀛社社員鄭金柱，意圖「島內官民共舉皇道精神昂揚，民族文化甦生益盛之秋，亦躍起鼓吹東洋文學漢詩復興普及動向」，故以「文風」為題，發起全島徵詩。<sup>81</sup>

1937年8月1日，鷺洲吟社兼瀛社社員鄭金柱，以「為欲振興文風，共挽存一綫之斯道起見」為由，列「東洋平和、防衛圈、義務教育、生活改善、航空、觀音山遠眺、圓山即景、阿里山探勝、日月潭、新高山冬景」等十題，發起全島徵詩。<sup>82</sup> 1938年，鷺洲吟社兼瀛社社員鄭金柱，提倡「宣揚國威，振興皇道，兼甦生民族文化，同維國風藝術，使一般起忠君愛國之

78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1476號，昭和7年（1932）3月22日，第4版。

79 《詩報》63號，昭和8年（1933）7月15日，頁1。

80 《詩報》85號，昭和9年（1934）7月15日，頁1。另參見《詩報》93號，昭和9年（1934）11月15日，頁3。

81 《詩報》137號，昭和11年（1936）9月17日，頁1。

82 《詩報》158號，昭和12年（1937）8月1日，頁1。

觀念」，合稱「愛國吟稿」，進行全島徵詩，並委由謝雪漁、林述三、謝尊五、顏笏山等評選。<sup>83</sup> 1939年紀元節，瀛社例會以〈祝海南島戰捷〉為課題。<sup>84</sup> 1940年1月，謝雪漁在其主編之《風月報》「詩壇」專欄發表〈敕題迎年祈世恭賦〉，另有鄭金柱等四人同題之作刊出。

#### （四）櫟社復興傳承期，瀛社戰爭宣傳期：1941-1945

櫟社本期可稱為「復興傳承期」，瀛社則是緊密配合戰爭時期國策宣傳，可稱「戰爭宣傳期」。

1941年3月9日，林獻堂、傅錫祺為謀復興櫟社，邀集第二代社員10人集體入社。社長傅錫祺朗讀社則，林獻堂對新社友致歡迎辭及今後之希望，櫟社第二代生力軍正式入社。林獻堂倡組之「漢詩習作會」，始於昭和15年（1940）12月23日，本年正式定期作詩，全年共計有22期。6月12日，林獻堂、傅錫祺赴彰化參加「應社小集」，與應社成員唱和。其中賴和與林獻堂兩人的唱和詩，共同以隱微的詩句，表達對台灣處在戰爭時局的強烈憂心。1942年3月1日，開總會於林獻堂宅，社員14人，來賓4人出席。葉榮鐘、張賴玉廉兩人經林獻堂、莊垂勝推薦，加入為新社員，葉榮鐘從此正式成為櫟社第二代中的生力軍，日後對傳承第一代的抵抗精神，具有標竿性的意義。

1943年2月起，林獻堂、傅錫祺為《櫟社第二集》之編輯成書，密切會商，進行實際作業。4月大致編妥後，傅錫祺因擔心部分詩作無法通過戰時嚴苛的出版檢查，而刪除陳槐庭、葉榮鐘七絕各一首。9月21日，《櫟社第二集》編成，10月8日被日本官方禁止發行，理由是：「凡無對應時局之文學，此後皆要禁止。」10月11日傅錫祺致函林培英談及此事，語氣頗感無奈。此事反映戰爭時期日本官方對台灣全面的掌控日趨嚴厲，而櫟社努力維

83 《風月報》62期，昭和13年（1938）4月15日，頁18。續見《詩報》184號，昭和14年（1939）9月1日，頁24。

84 《風月報》84號，昭和14年（1939）4月24日。

持一貫的立場，並非易事，其活動也更加艱難。

1944年1月5日，櫟社兩代社員林獻堂、吳子瑜、林培英、莊幼岳等八人及南方雜誌社賴青蓮女士，以米分有限，各攜盒飯至潭子傅錫祺宅，集會作詩，該社對漢詩創作的堅持，由此可見一斑。1月16日，林獻堂、傅錫祺、吳子瑜等社員七人，來賓王少濤（瀛社成員）、楊雲鵬兩人，至台中林培英宅集會作詩，有〈老松居茗集〉，林獻堂、傅錫祺、林培英的詩，同樣對時局表達間接的不滿與消極的抵抗立場。<sup>85</sup>

由於原本是瀛社主要發表媒介的《臺灣日日新報》在1937年以後停止發行漢文欄，戰爭時期的瀛社活動，資料較為有限。不過從《詩報》、《南方》雜誌，卻仍可發現不少訊息，從例會與徵詩的詩題來看，都是緊密配合戰爭時期國策宣傳而擬定。舉例如下：1941年鷺洲吟社舉行例會，以「祝志願兵制度施行」為題，並邀請瀛社社長謝雪漁、社員謝尊五擔任詞宗。<sup>86</sup> 1942年瀛社例會，以「祝新嘉坡陷落」為題，由黃贊鈞、黃純青擔任詞宗。<sup>87</sup> 1943年，瀛社例會以「海軍志願」為題，由魏清德、謝尊五擔任詞宗。<sup>88</sup> 1944年，瀛社第一期課題，以「賦得艱危氣益得忠字」為題，由社長謝雪漁、魏清德擔任詞宗。<sup>89</sup>

又如，1944年瀛社第四期月課題，以「題鄭成功受降荷人圖」為題並擴大舉行，聘謝雪漁、黃石衡、李石鯨、黃春潮、魏潤庵、陳南都、林文訪、吳夢周等八人為詞宗，並將所得詩作編為特輯《攘夷詩榜》，意圖為「東方民族吐氣、發揮文章報國精神」。<sup>90</sup> 所謂「攘夷詩榜」徵詩，是套用中國古

85 〈老松居茗集〉原稿，為林培英長子林中堅珍藏，並提供筆者參考。筆者撰寫〈皇民化浪潮下的文化抵抗策略——論太平洋戰爭（1941-1945）期間的櫟社活動〉一文有所討論，該文發表於「皇民化與台灣」台日學術研討會（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日本拓殖大學主辦，2006.05.13）。

86 《詩報》253號，昭和16年（1941）8月2日，頁12。

87 《詩報》269號，昭和17年（1942）4月3日，頁13。

88 《詩報》298號，昭和18年（1943）6月25日，頁4。

89 《詩報》308號，昭和19年（1944）1月1日，頁18。

90 《詩報》315號，昭和19年（1944）5月9日，頁1。

代所謂「尊王攘夷」的概念，巧妙以鄭成功驅除荷蘭人的史實，連結「只要黃種人團結，終將趕走白種人」的政治論述。這是台灣詩壇被動員，配合戰爭時期日本「大亞洲主義」、「東亞共榮」論述的典型產物。

### （五）櫟社戰後式微期，瀛社戰後重整期：1945-1964

先談櫟社之戰後發展，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櫟社社長傅錫祺有〈乙酉八月十五日〉、〈秋日雜詩〉等強烈批判日殖民統治之作。<sup>91</sup> 1946年4月14日，櫟社舉行戰後之第一次詩會，以「吟壇光復」為題。4至6月櫟社課題詩作，分別有「受降城」、「省參議會首屆召開感作」、「送倭人返國」、「慰被驅從軍生還者」等題，皆與時局有關。而社長傅錫祺有〈命運〉、〈民主〉兩首詩，對陳儀代表國府來台接收之後的失政，強烈表達幻滅與失望，反映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前，民間壓抑的不滿情緒已瀕臨爆發邊緣。8月27日，擔任社長長達30年的傅錫祺去世，這也意味著櫟社上一世代凋零殆盡，即將走入歷史。

1947年1月26日，櫟社在彰化銀行總行召開大會。會中追弔已故社長傅錫祺，並由林獻堂接任社長，正式邀第三批社員加盟，計有洪炎秋、周定山、洪元煌、林攀龍、許文癸、連德賢、張煥珪、楊國喜、蔡旨禪等九人（11月又加入王達德、黃爾璇、吳維岳等三人）。<sup>92</sup> 一個月之後，台灣當代史上的最大悲劇「二二八事件」發生，莊垂勝受牽連被捕下獄，七日後獲釋。事後林獻堂、莊垂勝、葉榮鐘均有相關詩作，或隱藏悲痛，或強力批判，或自抒受害心境，或哀悼台灣人才之慘遭屠殺，感慨極深。<sup>93</sup>

1949年9月23日，林獻堂搭機赴日，直到1956年去世為止，未再返

91 傅錫祺，《鶴亭詩集》（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6），頁312-313。

92 1937年1月「櫟社大會記錄」，原件由傅錫祺家屬保存。另見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一文，發表於「紀念櫟社成立百年學術研討會」（國家台灣文學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主辦，2001.12.09）。

93 廖振富，〈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台灣古典詩析論，以詩人作品集為討論範圍〉，《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期（2005.10），頁113、116、119。又收入〈詩與時代創傷：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台灣古典詩析論〉，《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

台。櫟社活動遂趨沈寂。1956年9月8日，林獻堂病逝日本。1957冬日，櫟社的兩代社員集會於霧峰萊園，並於20年題名碑前合影留念，以〈萊園雅集〉、〈過櫟社碑〉為題作詩。此二題，葉榮鐘之作皆留存。<sup>94</sup> 1960年代以後櫟社活動漸稀，此後，該社實質上已從歷史舞台淡出。<sup>95</sup>

再看瀛社戰後的發展狀況，1945年9月，林佛國有詩〈臺灣光復喜賦〉七律三首。<sup>96</sup> 1946年3月，林佛國作〈送古邨翁東歸〉、6月作〈中山堂雅集拈覃韻〉、11月作〈奉祝國府蔣主席六秩華誕〉七律四首。<sup>97</sup> 而繼洪以南之後，長期擔任瀛社社長的謝雪漁，則在1946年獲邀擔任「蔣中正六十華誕祝壽徵詩」的評審，顯示謝氏已成功轉化其「漢文資本」，重新擠進戰後台灣漢詩壇的主流位置。<sup>98</sup>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瀛社的林佛國、李建興皆有直接書寫二二八事件之詩作留存。<sup>99</sup> 而魏清德、黃純青、謝尊五、林子惠等人，則都有〈和林獻堂先生二二八事變感懷原韻〉一題，與林獻堂原詩同時發表於《正氣月



94 參見新版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書前所附相片，說明為「丁酉冬日櫟社重興合影」。〈萊園雅集〉、〈過櫟社碑〉（台中：晨星出版社，2001.01），頁208-209。

95 林獻堂在1956年去世之後，櫟社活動漸稀，後來可能由林攀龍接任社長（但攀龍是曾留學日本、歐洲的新世代知識份子，終生並未見其從事漢詩創作。）之後的櫟社活動，目前可見記錄有（1）1962年4月29日，林攀龍召集櫟社活動。（2）1963年8月1日，許文葵經手「訂購正金網中堂」祝「自由中國52年度詩人大會」。（3）1965年6月27日櫟社舉行詩會，由許文葵經手雜支。以上資料，由葉榮鐘家屬捐贈清華大學圖書館收藏。另外，《葉榮鐘日記（下）》1975年1月4日曾記載：王友芬來拜訪葉榮鐘，談重振櫟社之相關事宜，葉榮鐘答應他找林攀龍商量此事（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03），頁957。

96 林佛國，《長林山房吟草》（台北：龍文出版社，2006.06），頁50。

97 同註96，頁51-53。

98 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1945-1949）〉，「紀念二二八事件60週年」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主辦，2007.02.26-27）。

99 廖振富，〈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台灣古典詩析論——以詩人作品集為討論範圍〉，《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期（2005.10），頁115、118。

刊》2卷2期，<sup>100</sup> 這些作品在充滿深沈的感慨之餘，基本態度都與官方立場相近，將事件視為奸徒叛亂，並肯定政府處理態度之寬大。若考量當時風聲鶴唳的政治環境，以及詩作公開發表的心理壓力，會出現這種寫作趨向自是不難理解。不過就整體表現來看，瀛社詩人關於二二八詩作的書寫立場較為保守，與櫟社之強力批判的發言位置有明顯的差異。

1949年3月13日，瀛社創立40週年，社員李建興以瀛社名義召開全省聯吟大會，兼祝其母80大壽，于右任、梁寒操、孔德成等大陸來台之國府高官、名流首次與會。1953年第二任社長謝雪漁去世，魏清德接任社長。1959年3月，瀛社舉行50週年紀念會，于右任、賈景德等應邀出席，決定於本年詩人節召開全國詩人大會。外省籍黨政官員參加瀛社活動，與日治時期日籍官員之經常應邀出席瀛社集會，雖然分屬不同時代與政權，卻都同樣以詩社為共同活動場域，這種官民互動模式及其功能性目的，似乎頗有雷同之處。

從上述情形觀察，瀛社在戰後初期經歷短暫中斷之後，隨即在國府全面撤退來台之際，迅速重整人力，與國府黨政軍資源緊密結合，並在外省籍人士支持協助之下，其後的發展似乎又恢復日治時期之榮景，重新站穩全台詩社之主導地位。

## 五、兩社盛衰走向不同之觀察

雖然櫟社與瀛社具有相當多的差異，但其實也有不少相似的特質，<sup>101</sup> 限於時間，本文不及詳細處理。其中兩大詩社都曾盛極一時，位居全台領導地

100 最先探討《正氣月刊》所刊載的林獻堂〈二二八事變感懷〉原詩，及其他唱和詩作的是顧敏耀，參見顧敏耀，〈臺灣古典詩與二二八事件——以林獻堂、曾今可及其步韻詩為主要研究對象〉，《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06）。不過該文記載《正氣月刊》2卷2期發行日期為1946年5月，是一明顯錯誤（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2月），由於筆者尚未獲睹該刊，無法查證發行之正確時間是否為1947年5月？另外，瀛社主幹謝雪漁，目前尚未發現有相關詩作留存，態度不明。

101 如兩社都以唱和、擊鉢吟為集會之主要方式，而早期詩會活動，都充滿交際、聯誼及娛樂性質，筆者另有專文〈連橫《瑞軒詩話》及其相關議題探析〉，對兩社早期活動共同的娛樂性質有所探討，該文初稿曾發表於「台灣古典詩與東亞各國的交錯」國際學術研討會（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2008.11.29-30）。

位之原因，則明顯出自以下共同優勢。

(一) 由全台影響力之仕紳階層與文壇菁英所領導，核心成員文壇地位或文學成就較高，有一定的號召力，能代表當時台灣古典文學界的成就。兩大詩社之代表人物，前文已有說明，不擬贅述。

(二) 擁有媒體之傳播力量：一反傳統詩社小眾傳播、訊息封閉，20世紀新興傳播媒體的興起，是詩社影響力擴大的主因。櫟社主要藉助於《臺灣新聞》、《臺灣文藝叢誌》，櫟社社員傅錫祺長期擔任《臺灣新聞》編輯，其他社員包括陳瑚、陳貫兄弟，林載釗、鄭汝南、莊雲從等社員也都曾任職該報，因此該報可說是櫟社發佈消息與作品的大本營。另外，《臺灣文藝叢誌》是由櫟社所創辦，屬於全台漢文界之共同園地，該刊對提高櫟社之文壇領導地位，也有直接促進作用。至於瀛社則主要憑藉《臺灣日日新報》，該報是日治時期台灣發行人、發行時間最久的報紙，其讀者之多，影響力之大，不言可喻。瀛社能迅速發展擴充，與該報密集發佈瀛社訊息，刊登作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三) 擁有財力雄厚的支持者：櫟社之運作，除了平時依靠社員所交之社費，大部分都有來自以林獻堂為首的霧峰林家長期支持，舉凡數度舉辦大型詩會，每次動輒連續數日，櫟社20年題名碑之製作、櫟社成立30年訂製銅鐘三座，都需龐大的金錢，而林獻堂是最大的資助者。櫟社在二〇年代末期到三〇年代中期，則有吳子瑜以台中「怡園」、「東山別墅」為基地的長期贊助，吳子瑜之闊氣，甚至廣被全台與中部各大詩社之活動。至於瀛社，主要之贊助者則是以礦業起家累積龐大產業的基隆顏家，顏雲年、顏國年兄弟對瀛社活動之支持，充分展現其豪氣與慷慨之風。另外，板橋林家的林熊徵曾擔任瀛社名譽社長，想必對該社也有不少挹注。

至於戰後櫟社走向衰微，而瀛社能一枝獨秀，延續至今，其背後之原因相當複雜，以下是筆者初步的推測。

(一) 封閉式「少數菁英」與開放式「吸納百川」的不同經營策略。

櫟社採取菁英策略，不輕易吸收新社員，對文學素養、道德品格的要求標準較為嚴格。戰爭時期集體入社的第二批社員，乃至戰後1947年的第

三批社員，其實都是第一代社員的弟、子，或門生故舊，因而不免出現「近親繁殖」之負面效應。雖對詩社基本立場之掌控，有其便利，但在文學素養上，卻不一定能保證能繼承第一代之高成就，新社員也未必以古典詩見長（如林攀龍、洪炎秋）。因此當社團人數有限，而傅錫祺、林獻堂等領導者去世之後，也就失去中心人物而難以為繼了。至於瀛社之包容性大，對入社者並不設限，固然有品質不一、精粗難辨的問題，卻可以常保運作之活力，維持相當的人力資源，代代相傳而不絕。

### （二）政治立場與區域特質

從區域特性來說，台北瀛社與台中櫟社之發展，走向迥異的道路與歷史命運，恰好微妙呈現台灣島之「中心／邊陲」關係。以台北為核心的北台灣，從清末劉銘傳時代開始，跨越日治到戰後，向來都是全台之政治與經濟中樞，留居台北地區之台人知識份子，不論其出身地為何，如果對個人發展有積極的企圖或雄心，勢必與當政者採取合作或協力之關係。<sup>102</sup> 瀛社從日治到戰後，都能適時順應時代，與當政者保持良好互動。而中台灣之文學與政治團體，在日治及戰後初期都較具「在野性格」，與當政者較為疏離，甚至採取對抗關係，從舊文學到新文學皆然。<sup>103</sup> 櫟社逐漸走向式微，瀛社卻能在不同階段都能調整走向，站穩腳跟，與此應該不無關係。

（三）歷經新舊文學板塊消長之後，當代瀛社能保持與時俱進的高能量。

以上所論兩點差異，是就日治到戰後初期而言，若將視角延伸到當代，則吾人不可忽視的一個現象是：當晚近政治力對詩社的介入越來越消褪、淡薄之後，瀛社終於有機會逐漸擺脫沈重的歷史包袱，在逆境中尋求再生的力量。尤其新血輪的加入，新思維的展現，網路資源的整合運用，都展現高度創新的活力與持續蓬勃發展的可能，論當代台灣文學，對此現象實不宜輕易

102 瀛社主力中，洪以南、黃純青、林佛國是台北人，魏清德原籍新竹，謝雪漁、林湘沅原籍台南。但以上諸人政治立場，大抵相當一致，多半與日本官方或戰後之國府當局保持親善關係。

103 中台灣之詩社，除櫟社之外，由賴和、陳虛谷、楊守愚等人籌組的彰化應社，也具有較為鮮明的本土意識。至於新文學團體「台灣文藝聯盟」，更是成立於台中的全島文藝界首度結盟。

漠視。不過，當代瀛社發展，所面臨的困境不是傳統詩社的彼此競爭，而是新文學之獨大，與現代人對古典詩的疏離。而這是戰後所有傳統詩社共同需面對「如何改造？如何重生？」的龐大課題。

## 六、結語

瀛社與櫟社共同列名「日治時期台灣三大詩社」，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在20世紀初期台灣新文學興起之前，這兩大詩社可說是匯聚台灣舊文學菁英的文學團體。領導者分別是台灣北部與中部的社會菁英與仕紳，從文壇到社會乃至政治面，他們往往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另外，由於他們同時能掌握傳播媒體的力量，更明顯提升了這兩大詩社的能見度與號召力。櫟社與瀛社在1909-1912年間，往來較為頻繁，共同締造當時台灣詩社興起的首度熱潮。然而由於成立背景與動機不同，組織性質迥然有別，導致兩者的活動樣態與發展歷程存在不少差異。

就瀛社的集體活動而言，鮮明呈現以下特色：其一，組織鬆散而開放，參與人數眾多，聯誼性強，以文學為名的社交功能不斷被強化，文學的本質也就相對薄弱。這是1920年代以降，新舊文學論戰期間，傳統詩社飽受攻擊的主因。其二，從日治到戰後初期，瀛社主幹與當權者都能保持較為密切的關係。這固然有利於組織之運作，社務之蓬勃發展，乃至個人權力之掌握，但無可避免容易遭來「向當權者靠攏而喪失風骨」之批評與質疑。以上兩種相關的因素，反映古典詩之功能性、目的性被過度膨脹消費，理想性消失，直接導致「古典詩」本身被污名化的惡果。當然這種現象不獨以瀛社為然，而是當時眾多詩社之共同現象，不應由該社承擔全部罪名，不過以瀛社顯赫之聲勢與龍頭地位，成為這種創作傾向的代表者，可謂其來有自。<sup>104</sup>

---

104 王幼華，〈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構接——以瀛社為例〉「結論」（頁48）的下列引文，可為參考：「作為以漢詩創作的日本國民，瀛社社員扮演了相當成功的角色，溝通官民之間的關係，發揮了媒介者的功能。值得再注意的是……日據時期詩社『維持漢文命脈』的觀點又被提出，並將其中的民族意識加以放大，加以強化，有意忽略表露效忠殖民政府的區塊，成為國民政府與在台人士可以互相言說的場域。這是臺灣一直缺乏主體性，不得不被迫隨政權移轉而轉向的可悲之處。就瀛社在日據到光復這段期間的發展來看，不僅在提倡漢詩寫作上有其作用，在政治、社會上亦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台灣學研究》7期，2009.06）。

相對而言，櫟社因為封閉性的組織特質，對長期發展造成嚴重的侷限，由於「菁英領導」的特質太過明顯，前一世代的凋零，導致該社無可避免在歷史舞台提早謝幕。換個角度觀察，就政治參與或文學表現而言，其成員恐怕未必都能領受當代文學史論述過高的評價光環而當之無愧。但是，無論從理想性的設定與堅持，乃至組織的嚴謹與文學風骨之一致性，或是對台灣社會之貢獻程度觀察，櫟社之倍受後代讚許，逐漸被型塑出崇高聲望，仍有其「傳統詩社文學典範」的指標性意義，不容抹煞。

總結本文，筆者認為：從日治到戰後，台灣傳統詩社的發展與社會脈動、文學潮流、政治及文化認同均有密切關連。如果從民族認同加以評價，櫟社核心成員所彰顯的文學與事功表現，無疑能獲得較高的肯定。不過，若論參與者之眾多，以及詩社之普及化，瀛社顯然扮演較積極而活躍的角色。甚至近百年台灣漢詩寫作傳統之能延續至今，以及在當代透過網路串連而「再生」，則瀛社之努力貢獻特大。

另需說明，本文宗旨是以瀛社與櫟社兩大詩社的發展歷程與特質進行對照分析，雖以「風騷百年」為標題，實則討論的時間點僅集中在從日治到戰後初期，約略以六〇年代為下限。至於戰後的瀛社發展，牽涉更多複雜的因素，應有更多專題研究，本文無法細論。此外，由於筆者對櫟社掌握較為清晰，而瀛社史料份量相當龐大，卻因長期受到忽視，研究成果較為不足，筆者短時期內的理解有限，且本文性質屬於鳥瞰式的輪廓分析，掛一漏萬，或以偏蓋全，在所難免。筆者期待今後有更多研究者持續對瀛社、櫟社，乃至南社，進行集體性與個別性的探討，從點到面，乃至累積成立體的寬闊視野，容許更多元的詮釋觀點，跳脫現有論述框架，則必然能對台灣傳統詩社與傳統詩人及其創作，獲得更周全深刻的研究成果，從而豐富台灣文學的建構與內涵，以期逐步開展這一門新興學術領域的遠景。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郭怡君、楊永彬編，《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復刻本，（台北：南天書局，2001.06）。
- 龍文出版社編輯部整理編印，《詩報——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大成》，（台北：龍文出版社，2007.04）。
- 傅錫祺，《傅錫祺日記》（未刊行手稿自印本）。
- ，《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台中：興南新聞社印刷，1942.06）
-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出版，2000.11）。
- 葉榮鐘，《葉榮鐘日記》（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03）。
- 許雪姬編纂，《灌園先生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04）。
- 謝雪漁，《雪漁詩集》、《晴園詩草》合刊本（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6）。
- 林幼春，《南強詩集》（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6）。
- 林佛國，《長林山房吟草》（台北：龍文出版社，2006.06）
- 葉榮鐘，《少奇吟草》（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12）。
- 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6.03）。
- ，《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07）。
-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12）。
- ，《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07）。
- 許俊雅，《黑暗中的追尋：櫟社研究》（中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06）。
- ，《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09）。
- 林正三、許惠玫編，《臺灣瀛社詩學會會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10）。
- 、許惠玫編，《歷屆詩題便覽》（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10）。
- 、洪淑珍編，《十年題襟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10）。
- 、翁正雄編，《瀛社風義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10）。
- 顧敏耀等，《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06）。

## 二、論文

### （一）期刊論文

- 文山遺胤，〈台北詩社之概觀〉，《台北文物》4卷4期（1956.02）。
- 許俊雅，〈回顧與前瞻——近二十年來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述評〉，《漢學研究通訊》25卷4期（2006.11）。
- 王幼華，〈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構接——以瀛社為例〉，《台灣學研究》7期（2009.06）。

### （二）碩博士論文

- 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86）。
-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1996）。
- 吳毓琪，〈南社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7）。
- 張端然，〈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台北：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 許薰文，〈日治時期櫟社文人四家詞作析論——林癡仙、陳貫、陳槐庭、蔡惠如〉（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01）。
- 吳宗曄，〈《台灣文藝叢誌》（1919-1924）傳統與現代的過渡〉（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06）。

### （三）研討會論文

- 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紀念櫟社成立百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國家台灣文學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主辦，2001.12.09）。
- 施懿琳，〈台灣文社初探——以1919-1923的《台灣文藝叢誌》為對象〉，「紀念櫟社成立百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國家台灣文學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主辦，2001.12.09）。
- 柯喬文，〈日治前期漢文傳媒與現代性研究——臺灣文社與《臺灣文藝叢誌》〉，《2005台中學研討會——文采風流論文集》（台中：台中市文化局，2005.12）。
- 廖振富，〈皇民化浪潮下的文化抵抗策略——論太平洋戰爭（1941-1945）期間的櫟社活動〉，「『皇民化與台灣』台日學術研討會」論文（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日本拓殖大學主辦，2006.05.13）。

黃美娥，〈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1945-1949）〉，「『紀念二二八事件6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主辦，2007.02.26-27）。

朱雙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漢詩社詩作的主題分析〉，「『台灣古典詩與東亞各國的交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08.11.29-30）。

### 三、電子媒體

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來源：<http://140.120.81.240/ddnc/ttswebx?@0:0:1:ttsddn@@0.7471459490363714#JUMPOINT>，2009.10.19）。

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民報》電子資料庫〉，（來源：<http://140.120.81.240/ddnc/ttswebx?@0:0:1:ttsddn@@0.7471459490363714#JUMPOINT>，2009.10.19）。

瀛社，〈臺灣瀛社詩學會——網路古典詩詞交流園地〉，（來源：[tpps.org.tw/phpbb](http://tpps.org.tw/phpbb)，2009.10.19）。

